

目 录

综述.....	(1)
文献资料.....	(9)
成都 3 月 14 日抢米事件与大批逮捕共产党员的报告	(9)
叶〔剑英〕、董〔必武〕致王明转中央电.....	(19)
潘梓年致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的信.....	(19)
附：王世杰、贺国光等为成都营业分处被捣毁罗世 文等被捕往来信函.....	(20)
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	(22)
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 的指示.....	(22)
附：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象 告成都及全四川同胞书.....	(25)
邹风平给南方局的报告（节录）.....	(27)
川康特委报告书（节录）.....	(30)

张曙时给中央统战部的报告（节录）	（ 40 ）
周恩来致张冲的信	（ 45 ）
程子健在延安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 48 ）
档案资料	（ 55 ）
省政府转饬调查车耀先在蓉活动情形密令	（ 55 ）
国民党四川视察员项学儒向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文	（ 56 ）
省会警察局为本市发生抢米事件应加强防范的通令 稿	（ 57 ）
警察局督察处黄叔恺关于调查美丰仓栈被捣毁情形 报告	（ 58 ）
车耀先之妻报告其夫被逮捕情形呈	（ 59 ）
省政府为查明车耀先被捕情形密令	（ 59 ）
警察局南区分局造报镇压市民抢米受伤员警情况表	（ 60 ）
省政府饬知查禁《时事新刊》社密令	（ 61 ）
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成都市执行委员会训令	（ 62 ）
警察队方季容关于请发犯人伙食费用签呈	（ 62 ）
少城镇镇长报告车耀先被捕情形呈	（ 63 ）
省政府查办外南黄门街仓栈被抢训令	（ 64 ）
省政府追缴《时事新刊》社登记证训令	（ 65 ）
邓锡侯、潘文华转饬协商维持平果米店秩序的代电	（ 66 ）
四川省政府指令	（ 67 ）
成都行辕对川康防止奸党活动对策	（ 67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各省党部密令.....	(69)
报刊资料	(71)
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	(71)
讨汪拥蒋 团结抗战.....	(75)
盐警队与联保冲突 五通桥全场罢市.....	(77)
成都行辕下令查封米仓.....	(78)
米价高涨原因.....	(79)
本市查封各种食粮统计三万三千余石.....	(79)
本市米价暴涨事件的总结 (节录)	(80)
回忆录	(81)
回忆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	(81)
关于成都“抢米事件”的回忆.....	(88)
国民党特务制造“抢米事件”逮捕罗世文、车耀先 等同志.....	(89)
回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	(93)
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现场目击纪实.....	(95)
《时事新刊》的诞生和被查封的经过 (节录)	(95)
“告成都及全四川同胞书”是怎样送到成都的.....	(98)
参考资料	(100)
在成都“春荒暴动”的掩盖下.....	(100)
抗战中期蒋帮制造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四川 地下组织的真象.....	(111)
《戴笠其人》 (节录)	(118)

张严佛（又名张吉夫）关于成都“抢米事件”及在 重庆罪行的供词（节录）	（ 121 ）
国民党军统川康区组织材料（节录）	（ 126 ）
国民党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组织材料（节录）	（ 127 ）
国民党特务在成都新闻界的罪恶活动（节录）	（ 127 ）
思想反省自传	（ 129 ）
后记	（ 130 ）

综 述

1940年3月，成都发生的“抢米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推行反共投降政策，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之一。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四川的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是为了压迫四川地方实力派，从而加强对四川的控制。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成都“抢米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反共投降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英、美帝国主义则酝酿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势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

提出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并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反共投降活动。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如袭击陕甘宁边区，进攻山西抗日决死队和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制造“平江惨案”、“确山竹沟事件”等等。成都“抢米事件”就是这次反共高潮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和策略的指引下，战斗在四川各地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爱国学生、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许多进步团体，出版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使四川和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迅猛发展。为了加强对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到四川恢复和重建党组织。1938年1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并陆续建立了成都、重庆两个市委和泸州、自贡、宜宾、南充等中心县委。1938年12月建立了“中共川西（康）特别委员会”和“中共川东特别委员会”。随着全省各级党组织陆续建立，党员队伍有了很大发展，据1938年底统计，全省党员达30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感到极大的恐慌，利用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从1938年到1939年，在成都制造了“川大稻草案”、“郫县事件”、捣毁“星芒社”、“战时出版社”等事件。成都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阴谋一一破产。蒋介石为了加紧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扭转局

面，派其亲信贺国光到成都，出任成都行辕主任，策划更大的阴谋。

在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四川地方实力派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逐渐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早在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开展四川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即派张曙时等到成都作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后又派罗世文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刘湘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逐渐改变了过去的政策，提出了“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主张，并派王干青为私人代表秘密去延安，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1938年，刘湘死后，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直接做四川地方实力派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的工作。在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前，四川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顽固派相抗衡的事情时有发生。如1939年8月，在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的策动下，川军将领彭焕章、陈兰亭等7师长联电要求撤销投靠蒋介石的王瓚绪四川省主席职务，迫使蒋介石改组四川省政府，自兼省主席。又如四川地方实力派担心刘湘创办的《华西日报》落入蒋、贺手中，提出由刘湘系接管，并于1940年2月由邓汉祥、彭光汉、刘树成、王白与等组成董事会，接收了《华西日报》。与此同时，邵从恩、尹昌龄、李伯申等19人联电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对四川省政府关于新县制的预算高达1亿元以上提出异议，要求核实紧缩预算，使创痛已深的四川人民得以稍事喘息。再如同年3月，五通桥税警殴打地方保甲人员，形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冲突，导致五通桥全体商民罢市，经共产党人从

中调解才得平息。这些事件，大大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曾亲自打电话责问邓锡侯：“你能保证你下面没有异党活动吗？”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受共产党影响不断同他们作对，共产党在地方实力派的掩护下十分活跃。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从1939年底就加紧了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及压迫地方实力派的阴谋。

成都“抢米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借人为“米荒”，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事件。四川素有“天府”之称，川西平原又是四川的粮仓。1938年至1939年，四川农业获得丰收，据1939年的调查，“单就新都、成都两地，归仓现米不下数十万石”。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时也曾报道：“成都市区现有仓库存米不下十余万石”，可见粮食是充足的。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官员以及官僚、军阀、地主和商人纷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使成都地区出现了人为的“米荒”。从1940年初开始，成都市的米价逐日上升。2月19日每石米为43元，到3月14日竟上涨到70元，老百姓还经常买不到米，怨声载道。1940年3月，成都大小各报不断发表文章，要求政府“平抑米价”，“封仓平粜”，市郊一些地方连续发生贫民群集抢米和“吃大户”的事情。这种人为的“米荒”和米价飞涨造成的混乱局面，恰好给国民党顽固派早已在策划的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压迫地方实力派的阴谋提供了机会。1940年初，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窜到成都，召集成都行辕的特工人员开了一周的会议，进行秘密策划。3月12日前后，即有特务造谣说：“八路军已开到广元到处抢米，把米都买贵了”；“因抗战抽丁，田土荒芜，无人种田，以

致米贵”，“八路军未抗战，他们在后方捣乱”等等，为制造阴谋事件作舆论准备。1940年3月14日晚上8时左右，老南门外有人领头集合二、三百身份不明的暴徒（其中有穿黄呢裤者多人，有操下江口音者），前往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办事处仓库（外南黄门街）。暴徒们持手枪、木棒，解除了重庆银行仓库看门警卫的武装，捣坏仓板，致使大米流失遍地。事件发生时，警察在旁未加阻止。暴徒离开后，有附近贫民提着口袋前往拾米，而围观者甚多。当晚11时左右，突然开来五辆卡车，载着大批军、警人员，对群众大打出手，任意逮捕。住在重庆银行南门外办事处仓库附近南台寺的《时事新刊》报社编辑朱亚凡，在现场围观时被捕。事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给各报发出油印通知，不准登载事件经过，违者即予停刊处分。4月15日，各报新闻记者到省会警察局询问对被捕者的审问情况，警察局长唐毅声称：“今奉行辕命令，事关重要，不得发表，审问情形不得过问”。成都行辕则公开扬言，抢米是共产党干的，他们要趁米荒发动武装暴动。

紧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下，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唐毅，在听取审讯汇报时，得知3月14日晚在现场抓捕的有进步报纸《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中共党员），就立即会同在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特务、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吉夫）及中统特务、国民党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进行策划。他们认为：这是进一步扩大事态，嫁祸于共产党，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绝好机会。于是，将事先编造的口供和传单塞在朱亚凡的口袋里，诬陷朱是这次事件的组织

者和指挥者，并急忙于3月20日将其枪杀灭口。同时，把早已拟定抓捕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密报戴笠，经蒋介石批准执行。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再加上党内部分同志在“抢米事件”发生后对形势估计不足，认为除非国共两党公开破裂，国民党是不敢明目张胆地逮捕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因此，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没有及时转移，先后被捕的有：中共中央派到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营业部负责人洪希宗，以及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薛特恩、胡止游、唐介舟、熊唯知等。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查封了《时事新刊》，逮捕工作人员20多人。不久，国民党成都行辕又颁布了《川康防止奸党对策》，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使四川逐渐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抢米事件”，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3月15日）早晨，罗世文和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王叙五等人，在焦家巷特委机关召开紧急碰头会，会议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特委决定：提高警惕，立即组织党员转移。3月16日，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程子健等分散到成都市郊农村隐蔽，郑伯克留在市区内负责主持党员转移工作，并派人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报告事件经过。

中共南方局对成都“抢米事件”极为重视。3月17日，

叶剑英、董必武联名发电报给党中央，报告《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馆处被抄，罗世文等被捕的情况。叶剑英还及时向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络的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3月18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中共南方局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派甘道生（林蒙）专程到成都听取郑伯克的汇报。并采取相应对策，将身份已经暴露的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凤平、甘棠、张曙时等转移去延安，任命程子健为中共川康特委代理书记，于江震为组织部长，郑伯克为宣传部长，领导川康地区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继续进行斗争。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抢米事件”的阴谋，中共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指示中共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因当时成都没有市一级党组织），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并郑重声明：“共产党既未领导此次暴动，也未参加此暴行，相反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此种阴谋行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立刻彻底严查这次奸人匪徒行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人士”。4月5日，在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成都某方唆使奸人匪徒抢米，企图以此嫁祸共产党》为题，全文转载了《告同胞书》，并于4月8日和4月12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在4月8日以题为《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的社论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坚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明正大的政党，此次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这与共产党目前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因此，它只能是国民党内奸人匪徒企图挑拨国共关系，借以进行分裂投降，压迫共产党之口实。这种行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并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必须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根绝一切大小摩擦事件，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彻底打倒汪逆傀儡政府，把日本赶出中国去”。

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抢米事件”的真相，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加强了统战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党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中共中央在总结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经验后，及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要求各地和各级党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时刻戒备反共投降分子的武装袭击和破坏阴谋”。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党组织“尤须立即根据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关，调动隐蔽干部，以避免损失”。四川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党组织的形式、斗争方式等作了一系列转变，并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号召党员以社会职业为掩护，深入群众，长期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文献资料

成都三月十四日抢米事件与 大批逮捕共产党员的报告 (1940年3月28日)

一、原因

1. 顽固保守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共产党，削弱地方势力，以制造妥协投降的条件。

2. 地方势力中的上层分子对反动表示软弱（由于他们阶级性是一致的），本身不进步，对我们（共产党）敬而远之，对我们害怕。地方势力中下层分子不满顽固保守分子的行为的情绪日渐高涨，但由于上层的软弱，未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来有效地制止顽固分子倒退分裂行为。

3. 川康党的统战工作作得不够，对地方中下层分子的进步帮助得不够。工作作风是自流式，缺乏有机的自动的计划

性。故临事变到来，形成少部惶惶与大部麻木的现象，未能事前预先知道顽固分子的动向，了解他们的步步进逼〔布〕置情形，而及时的〔隐〕蔽红色分子，事前指出××反动分〔子〕的阴谋，提出明确切实的办法帮助地方中下层的进步来推动上层稳定。

二、促成这次事件的几个事实

1.嘉定五通桥税警队打击地方保甲，形成双方武装冲突。该〔地〕商民全体罢市援助保甲，向税警队抗议，地方军队闻讯，由嘉定跑步到五通桥，准备参加战争援助保甲。中央派专员到嘉定调解，初用高压大帽说这是捣乱行为，有三种人才捣乱。商民不服，更增愤慨。后经我们的同志调解，说明罢市是正确的，对的，但现在中央既来调解，维持后〔方〕的秩序，也是应该的，商民等方承认复业。这位大员碰钉后，外表上甚感我们的同志的帮忙，以后乃改变态度说，中央绝不与地方争利，地方与中央精诚团结，现在还是坚持抗战，绝不中途妥协投降。

2.省参议会一致反对新县制庞大的经费核算，要求审核预算，不赞成经济部各种统制办法，要求经济部不要与人民争利。但行政院来令说预算是行政机关的职责，省参议会无审核权。成都屠业反对增屠税曾罢市（现成都屠牛者仍甚少）。

3.成都《华西日报》原属四川省政府机关报纸，复兴社欲接收为已用，武德学友会不愿放弃，乃由彭师长派武装兵士接收，华西报未交与中央。

4.“三八”纪念节，国民党省妇委为表功起见，号称要

〔动员〕一千余群众来纪念，结果临开会时他们所动员的群众没有人，于是令到会的妇女在签名簿上签名，以便作他们动员的成绩。到会的妇女因已到会场坐定，不愿签名（这些都〔是〕妇抗、妇救所影响的），国民党妇委乃恼羞成怒，在台上大骂，说：“今天的会议为共产党所把持，你们都是受反动分子所支配。”警方〔捣〕乱，破坏秩序。当时抗战家属不服，上台声〔申〕辩质问，国〔国民党〕省妇委不准上台，抗属在下挤上质问，国〔国民党〕省妇委奏军乐来扰乱，抗属更愤激，称“我们的丈夫在前方抗战，你们反倒说我们是汉奸是反动分子，你们这样优待抗属吗！”此时会场秩序大乱，国〔国民党〕省妇委乃说共产党在捣乱，令警察进来捉人。新闻记者在一旁劝阻，国〔国民党〕省妇委在警察保护下吵骂而去。事后抗属妇女到国〔国民党〕省党部请愿，要求解释。于是，国〔国民党〕省党部乃倡言“共产党自去年‘九一八’消沉后，现又活跃起来。”

由于前述事实，顽固保守分子更认为共产〔党〕在地方势力掩护下更形活跃，地方势力受着共产党影响要同他们作对。于是他们便设办法来打击共产党，削弱分化地方势力，所谓“米荒暴动”就是他们自买自卖，一箭双雕的准备妥协投降条件的阴谋。

三、经过情形

1. 探查地方势力对共产党的态度：在省参议会时，康泽便搞来了所谓赖辉黄的通电，由中央社分配令各报纸发表。《华西日报》、《新民报》、《建国日报》、《时事新刊》等地方报纸完全没有登载，只有半地方性的《新新新闻》才

登载（此报有一半受“CC”支配，但以后都感到失悔）。贺国光见状，乃设宴招待各新闻界，乃说：“大家处世，要替别人留点面子……”当时《华〔西〕日报》社社长王××发言问：“这通电的确实性如何？谁可以负责证明？”贺无言。宾主不欢而散。

2. 威诱并下：蒋于贺国光宴新闻界后打电话与邓云：“你能保证你下面的没有异党活动吗？……”邓平素对禁烟、剿匪，自谓满有办法，公开不要中央来插足，但对蒋电，却回答：“不敢担保。”蒋对潘写信介〔绍〕罗××（原武德学友会分子，现已为“复兴”收买）任《华西日报》社长，潘乃承认照办。但武德学友会大部不愿交出《华西日报》……

3. 米的涨价：去年丰收，中央以谷贱伤农，乃令中国、中央银行与农本局大批购米囤积，以提高谷价……故农村谷物大批装入银行与农本局仓库，米价便从一元七八角逐渐上涨。最初还涨得缓，待各银行的仓库装得差不多时，便很快的涨至四元几至五元钱一斗（新斗）。3月12日，成都中央军校西较场白天失火，原因不知，军校乃传说系盛米仓库被焚。现将购买两万石以供食用，航委会也说要买一万石以供职工食用，此时成都全市存米还不到三万石。贺国光、黄季陆等乃实际止不住购米囤积。于是米更飞跃地高涨，12日至14日，米价由5元涨至7元钱一斗（一般老百姓都知道是囤积贵起来的）。

4. 事前他们的布置：康泽来蓉后便召集行辕政工人员开会一周，接着特务机关全部工作人员开会。3月12日前便发出谣言：“八路军已开到广元到处抢米，把米都抢贵了。”又说“抗战抽丁，田土荒芜，无人种田，以致米贵。”又

说：“八路军未抗战，他们在后方捣乱。”

5.抢米情形：14日晚上8点半后，在新西门外，中央军校西较场侧有着便服流氓二三百人络绎往老南门外，在上桑里吹哨集合（中有着黄呢裤者多人，并有操下江口音者），中有人发命令叫打重庆〔银行〕米仓库，于是流氓等持手枪和木棒解除重庆银行看门警〔卫〕的武装，捣坏仓板，并向天空开枪示威。当即捣坏仓板，白米遍地，流氓乃喊贫民来抢米。彼时参加之流氓乃呼：“打倒下江人。”“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后将临近各小银行略事捣坏，呼：“了事”、“集合”、“吹哨”、“解散”。当〔时〕警察在旁观看，未加阻止。只说你们不要唤人抢米。众乔装流氓散后，附近贫民乃有持口袋前往装米，在仓库旁围有很多人看热闹。

6.警察出来捕人：当晚11钟，警察才派了几部载重汽车开到老南门大石桥上拦人。在他们认为形踪可疑的过路人，便捉入车，有某大学生曾与巡官吵架。说入城回家，该巡官看见，乃捕入车内。当《时事新刊》有编辑二人在门口看热闹亦被捕去，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领导者，工人是实行者，贫苦市民是盲从者。如是共捕有百余人，全部押入警察局。此时，凡与巡官作对，有他恨〔的〕都可能被捉或已被捉。

7.对新闻封锁：当晚11钟，新闻检查所便与各报送来油印通知，令不准登载此事经过情形，违者，即予停刊处分。平日该所办事素来迟缓，送去的稿子要〔拖〕延很久才发回来，此次他们象事先知道一样。15日各新闻记者往警察局探讯被捕者审问情〔况〕，唐局长声称：“今奉行营〔辕〕命令，事关重要，不得发表，关于审问情〔况〕，不能过问。”

8. 蒋××对这事：14日晚中央社便接到蒋处理米贵〔案〕，平定米价，封仓出售的具体办法（实际被封的是地方银行的仓，出售也是地方银行的米）。同时行营〔辕〕乃公开宣言抢米是共产党干的，趁米荒时暴动。

9. 特务的活动：15日中央特务机关开了一整天的会，谣传十五六号要清检户口，逮捕共产党员。16日晚上6点半，罗世文同志到祠堂街《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刚入馆数分钟乃发现有数人在门口张望，报丁开门去看，乃有八九个着便衣的流氓向罗说：“行营〔辕〕请你去。”罗说：“拿公文来。”流氓等乃出枪挟罗出店向西而去（西边是行营〔辕〕）。分销处办事员洪希宗睹情，乃向组织报警，并即打电话来渝总馆。9点钟后，洪同志返店整理东西，而特务与流氓等又来店将洪挟持去，并声言要捉邹风平、杨××等。16日晚12钟，便衣特务同行有军警两排人将祠堂街“努力餐”围住，把车耀先捕去。18日又将参加中苏文协之唐××医生捕去。数日内被捕者有武德学友积极分子汪××、郭××。市政府科长、股长各一人，保长数〔人〕，学生七八十人。《时事新刊》编辑处、营业处被封，工友、职员凡在住宿者全部逮捕（当贺得知14日晚上捕有编辑二人，乃命令警局趁机速将《时事新刊》查封），地方特务遭逮捕者亦多，中央特务亦〔有〕被地方特务捕去者。

10. 枪毙《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同志：朱系于14日晚上被捕，先押至警局后解至行营〔辕〕。当在抢米时，朱在旁观看，于20日被便衣特务押至新西门外城壕（上午九钟许）枪毙，身中三枪，最后一枪由头部打入，朱口被塞……传说同时被枪毙〔者〕有三四，而公布只有朱一人，正午12

钟乃贴出枪毙事由竟为聚众暴动抢米……出布告者省绥两署名。

11. 民众的反映：一般的市民说：“米是奸商囤贵了的，怎样〔么〕不去办奸商呢？”“抢米是没有办法才抢的，抢米是不犯死罪的。”

12. 潘、邓的态度：贺拟了一个通人说：“共产党聚众暴动，搞乱后方秩序”等，贺说：“这事是委座的意见。”贺威胁邓、潘签名，不然就是袒护共产党。结果邓、潘是同意签名发表这通人，《华西日报》潘也准备交与复兴社。对郭××、汪××被捕，邓、潘〔愿〕意分别担保。但贺推说：“此事重大，委座拟亲自审问，现押运重庆。”武德学友会中下〔层〕大部分人不满潘的处置，拟全体辞职以迫潘。潘无办法乃闭门不见客，日夜与妓女作乐。事前他尚拟办干部训练班来团结地方军人，现不再谈办了。

13. 地方势力中下〔层〕正义人士总以为这次虽说是打击共产党，但地方人〔士〕却实际吃了亏。他们也知道是顽固保守分子“自买”、“自卖”的，但自己对共产党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把火色看好后再说……“CC”分子这次没有参加实际行动，他们认为复兴社这次干得瘟，在政治〔上〕没有好多效果。

二十四五号，被逮捕人渐少。据说他们准备继〔续〕清查线索，不采取大规模的逮捕方式，到条件成熟后再大量干。

四、我们的处置与对此事的认识

1. 对抢米的分析与警告的提出：15日上午开特常会，大家初对米价高涨，银行囤积居奇而引起贫民抢米尚觉应该。

个别的同志初曾提议与民主运动、彻底实行宪政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作为普遍深入的解释。继后知被〔打〕的是重庆银行等，乃决议慎重解释米贵〔案〕，反对同意打仓办法，积极要求政府合理平议〔抑〕米价，认定有可能嫁祸于我们，普遍嘱各级同志谨慎注意言行。并在新闻界布置，说明米涨真象，“要求政府切实合理评价”。15〔日〕下午得到更多情报，特常委同志认定他们（顽固保守分子）是学希特勒国会放火的办法，当晚与次晨即紧急通知各级同志戒备：所有文件不能移动至安全地方者，即刻焚毁；红色分子迅速遮蔽；经常会议时间减少，多采取个别碰头方式；尽可能少坐茶馆，茶馆内不得三人同去；书籍、报刊整理或移出室外，准〔备〕随时对付检查；对横的关系切实的割断。16〔日〕正午，特常〔会〕负责同志会见罗同志，嘱其注意。罗同志说：“今天的政治情势还不会这样。”16日下午罗同志被捕后，17日早晨特常〔会〕同志即督促执行必要准备，“迁居”。并派人到各中心县报警并帮助布置一切……但对《新华日报》仍照常营业。对罗、洪被捕，乃作公文呈绥靖〔公〕署与警备部，报告被捕，请其处理。

2.在谣言迷混中把握方向：十七八〔日〕以后，逮捕人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更多。他们说：“《新华日报》总馆已被查封捣毁；与日本妥协条件已经讲好；顽固分子围攻陕北，战争紧急，顽固军队被八路军打散十余团……说罗等已被杀……”当时我们对全国的材料得知很少，同重庆几乎等于短期失掉联络，但根据最近分析，日本与美国的矛盾，日本与国民政府的矛盾，国际阴谋家在经济上支持国民政府的问题，这些都不是目前可能解决，而顽固保守分子不过是为妥

协投降制造条件而已。这次事件虽与全国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相配合着，但仅是局部地方事件的性质，虽然它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却给我们更大的可能性去克服它。新的不满的情绪，广大的群众对现在旧的制度的认识是更进了一步的了解。目前地方势力是在迅速分化的过程中，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与言行更得审慎。目前中心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组织，使它不再受意外的损失。这次遭打击的是统战与文化部门，这是最后的没有撤退的突出部分。虽然他们这时是公开的合法的，但是他们打击起来是不管这些的，只要是不顺他的意，而他们打击得到你，就要干。今天公开与秘密的问题更提高它的重要的意义，半公开性质的团体是不容许的。

3. 获得的经验教训：这次事件对川康党组织一个很好的考验，第一是深入群众的工作做得不够，特别是统战部门，表现惊惶失措与麻木，最甚的是统战，青年次之，工人，妇女要好得多。上层分子过去肯出风头的干部，表现得比较厉害些。第二是公开与秘密的联系做得不够，在17〔日〕以后两三天内机构现〔显〕得很不灵活，有事未到碰头时间便找不到线索商议，致放弃一些有利的机会。如这次重庆上的汽车来调查事件经过，初报馆通知，组织无法知〔道〕，以后组织知道了，却不好直接去会，本来可以由组织写好交报馆送去，但当〔时〕彼此错过机会没有去做。第三，特委间彼此长处与缺点的相互交换帮助做得不够，及特委二人有病同过去的暴露，增加目前的一些困难。在正常会议生活中，大家可以讨论得出共同的结论，而能发展所长，但在此事件中，未有正常会议，曾短时表现步调紊乱的现象，虽然以后

迅速的补救，但究竟是损失。这次事件更又一次证明地方上层的不可靠性，本来过去我们曾同样的估计到。其次对各级同志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以致有一部分事前麻木，事后惶惶。因知识分子同志对革命理论原则曾学了不少，但应用这些原则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应付突然事变却不够得很。

五、我们今后的建议

1.彻底调整党组织，有计划的把川东南与川康特委与中心县干部适当的调换与配比〔备〕：现特常委中有二人已暴露，叛徒很多认识他们，这次特务声称要〔逮〕周〔邹〕××。中心县的干部已掉〔调〕换两三处，若再掉〔调〕换，则一人出问题全川康都得警戒。

2.建立秘密通讯关系：在现在一个不红的同志若进出办事处，也要变红，关于秘密通信地方、技术，希能设法解决，约定。南方局与川康通信希用秘密。

3.关于全国必要的情报的供给及印刷读物的供给，这是过去都感到不便的，经此次事件中更深刻的感觉到。

4.4月份的经费请付给。

5.关于目前政治上组织上希南方局给与我们指示。

6.周××同志准备来渝作详细的川康报告与加强××调整组织，得南方局同意与指示后即动身。

7.请用总馆名义向行营〔辕〕交涉，援助罗、洪二同志。完

此报告系徐文杰同志口头带来说，现由徐同志书写，文字未经川康特委看过，文责由徐同志负。

（中央档案馆档案）

叶〔剑英〕、董〔必武〕致王明
转中央电

（1940年3月17日）

王明并转中央：

甲、16日午后5时，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被抄一次，罗世文被捕去，至晚12时又来军警、便衣共五十余人，捕处内洪姓1人，处内存书、物、报抄劫一空。15日电川省府及成都市府报案，并与张谈。

乙、博12日飞往兰州，至今日尚无电来，你们是否接到博及伍修权的报告请复。

丙、此间昨日宣传，胡公已回国，飞抵兰州，胡公消息如何，亦请速告。

叶、董

（中央档案馆档案）

潘梓年致国民党宣传部长
王世杰的信

（1940年3月18日）

雪艇部长钧鉴：17日得成都营业分处电悉：该分处于16日下午5时许，有便衣队多人来分处捕去罗世文一名；深夜12时许，又捕去洪希宗一名。罗为第十八集团军工作人员，洪为该分处会计，二人因何被捕未能知悉。查该分处为合法

营业机关，呈请政府登记有案，自应受法律保障。今未蒙明示罪状，亦未经法律手续，横遭便衣队逮捕，且任意搜去营业票据财物，捣毁屋内什物器具，闻讯之余惶惑无似。谨此电闻，敬祈迅予彻查，以维法而伸冤屈，不胜急切待命之至，谨肃。即颂勋祺。

潘梓年

（附）：**王世杰、贺国光等为成都营业分处被捣毁罗世文等被捕往来信函**

（1）王雪艇^①批示：

送潘副部长阅后，密电成都贺秘书长查明原委及对被捕人员之处置。一面函复潘梓年，当天电询查照。又，该营业分处已否登记？

（2）孙思努报告（3月19日）

查该报前请指示关于分馆名称一节，经以：查报社在外埠设办事处向无成例，可更名为某某分销处。惟分销处只能代销报纸不得翻印纸版等语函复该报，并飭其将该报报首所刊分馆字样取消各在案。兹查该报在成都设营业分处，而不称分销处，显与本部前指示不合。又，该报报端号将分馆字样取消，而不遵照指示称分销处亦有未妥。

孙思努兼代

3月19日

①这是王世杰在潘梓年来信上的批示。

(3) 王世杰密电稿(3月21日)

成都贺秘书长元靖兄勋鉴：×密。据《新华日报》潘梓年函称，该报成都营业分处突于饯日①被便衣队捕去罗世文、洪希宗二名，请彻查等语到部。请兄询明原委及对被捕人员之处置情形，详为赐覆至感。弟王○○叩。寅养。印。

(4) 王世杰笺函稿(3月21日)

3月18日函悉。罗、洪二人被捕一案，当去电询查。先此函覆，即希查照。此致潘梓年先生。

王○○手启

(5) 贺国光覆电(3月25日)

中央宣传部王部长雪艇兄：寅养电奉悉。密。本案据潘梓年迳呈来府，经批：呈悉，令遵候查明核办等语，送达在案。承询敬覆：又蓉市寒晚②发生有组织之抢米暴动，当场获数十余人。经讯明确系无知盲从之人，多数开释，尚余少数主动份子，并抄获其乘机策动扰乱后方之秘密计划，刻正慎重审讯中。并闻。弟贺国光叩。有。秘。印。

(6) 王世杰函稿(4月2日)

前据函报该报成都营业分处职员被捕一案，经电询去后，兹准覆称：该案川省府正在查明核办中。特此函达，希即查照。此致
潘梓年先生

王○○手启

(原载《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

①即3月16日

②即3月14日晚。

中央关于成都事件对
南方党工作的指示
(1940年3月30日)

重庆：

(甲) 3月14日成都事件，明显地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应该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

(乙) 除成都市委发表宣言外，必须动员广大社会舆论及四川地方有关方面，广泛揭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

(丙) 必须立即将成都重庆及其他地方已暴露或可能已被反共分子注意之党的干部和党员调动和隐蔽，以避免破获。

(丁) 立即严令成都、重庆等地各级党部，将一切秘密文件焚毁，成都方面与世文直接联系之特委同志及其他同志，必须暂时隐蔽至安全区域，并尽量减少活动。

中央书记处

(中央档案馆馆藏)

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
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
(1940年4月1日)

致各级党委及部队领导机关：

甲、3月14日成都事件之经过——据报康泽主持之特务

机关，近来有计划的在成都制造各种阴谋事件，目的在借口打击共产党、救亡分子及四川地方势力。3月初在五通桥，曾因中央与地方人员冲突而引起全体商人罢市，地方军队与税警团已发生武装冲突。“三八”妇女节，特务分子又与救亡团体发生冲突。但在这些事件中，特务分子均遭失败。于是特务分子组织3月14日之阴谋事件，特务机关利用最近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农本局及地方重庆银行和四川银行发生混乱情形及人民生活痛苦不满之情绪，乃于14日组织打银行仓库之抢米风潮。是日下午8时，成都特务人员纠集三青团员及中央军校学生约三百余人，化装老百姓（但也有还未脱去黄呢制服者），从成都新西门出发，在老南门吹哨集合。首先捣毁地方的重庆银行，高呼“打倒下江人”，“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在捣毁重庆银行后队伍分散，然后又吹口哨在四川银行集合，将四川银行捣毁。当捣毁暴徒活动时，警察在旁不加丝毫干涉。由于仓库捣毁后，满地皆米，老百姓纷纷去拾米，至11点钟时，警察才大批出动，捕去拾米之老百姓约百余人。临近重庆银行的时事新刊社，该社刊为地方势力及文化界支持之刊物，因此特务机关将该刊职工多人借口捕去，该刊总编辑朱亚凡为共产党员，捕去后即被枪决，并诬为领导抢米主犯，事后复将时事新刊查封，将全体职工捕去。

乙、特务机关利用此次事件制造之阴谋案。一方面逮捕刘湘在世时所组织武德社之分子郭秉彝（毅）、汪某等；另一方面逮捕公开共产党员罗世文、洪希宗以及救亡团体、学校、政府机关中的共产党员约十六人；同时并逮捕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负责人车耀先及其他文化界十数人。在事件发生

后，特务机关大造谣言，说抢米风潮是共产党领导的，并说地方军队中有许多共产党员。

丙、此事发生后，叶剑英即向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络之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释放罗世文等，但毫无结果，同时何应钦故意向张冲说，此种小事那里管得了。

丁、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已发为抢米案件真象告成都和四川同胞书，说明此事系奸人暴徒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破坏中央地方团结之阴谋，共产党不仅与此事无关，并且坚决反对制造此类事件的奸人，暴徒分子。宣言在日内由延安新华社广播，望注意收，并在我们刊物上发表。同时根据宣言内容在刊物上写社论、短评，声援成都市委，和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无耻阴谋。

戊、“成都事件”的发生，华中顽固分子对新四军大规模进攻，八路军根据蒋介石手令及卫立煌要求，自动从林县至凌川线北撤后，中央军仍袭我兵站，杀我人员，劫我资财，并节节向我近逼。

中央军九十军李文部、蒋介石批准特务机关在六个月内逮捕所有暴露之共产党员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时局正处在严重的关头，反共分子的投降分裂活动正有加无已，各部及部队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时刻戒备反共投降分子的武装袭击和破坏阴谋，同时必须利用每个发生的反共阴谋事件，在党内外作广泛深入的教育和动员，以提高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戒心，以暴露、孤立和打击反共投降派分子。在国民党及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党的组织，尤须立即根据保存干部，蓄积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关，调动隐蔽干部，焚毁秘密文件，准备被捕的口供，给新干部、新党员秘

密工作和以被捕被审时应有态度的教育；尤其要有决心，将已暴露之党和非党干部调往安全地区工作或暂时隐蔽，以避免损失，而为此原因即损失一部分工作，亦须决心去做。

中央书记处

附：

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

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

（1940年3月14日）

成都市同胞们！全川同胞们！

3月14日在成都老南门外，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就是重庆银行和四川银行仓库，被奸人匪徒率领三百余人，化装老百姓，带短武器，于是日下午八时左右，从新西门出发，在老南门外，桐里吹哨集合，迳往重庆银行，将其仓库捣毁后，又集合于四川银行门前，同样将四川银行加以捣毁。在捣毁之后，复高呼荒谬绝伦之口号，“打倒下江人”，“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当奸人匪徒进行捣毁暴行时，警察在旁并未加以干涉，奸人匪徒在捣毁暴行之阴谋已达后，遂呼啸而去。而银行仓库附近，满地皆米。于是有附近之老百姓出来拾米，及附近之市民好奇围观者颇多，十一时许，有大批警察开到，将拾米之老百姓及围观者捕去近百人，与重庆银行邻近之时事新刊报馆之编辑和职工在旁观，亦被捕去多人。该报之编辑朱亚凡亦在其内，事后

加以莫须有之罪名，谓其领导抢米，当遭枪决。尤为奇特者，奸人匪徒在此次暴行后，将其自己所一手制造之暴行，企图转嫁祸于中国共产党，散布谣言说，此次抢米暴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此种阴谋早在希特勒于纵火国会事件时采取过，而遭受失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兹特郑重声明；此次成都抢米事件与中国共产党绝无任何关系。我们始终认为：在全国团结抗战的时候，此种匪徒暴行，只足以破坏国家民族的利益，只足以破坏团结抗战的利益；此种行为与共产党日前所实行之政策完全不相符合，共产党始终反对个人阴谋恐怖政策。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特郑重声明：共产党既未领导此次暴动，也未参加此暴行，相反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此种阴谋行为。

证之事实，此次阴谋暴行出之于有计划的行动，事前事后均足证明蛛丝马迹，匪徒所呼之荒谬绝伦之口号，则为出自奸人匪徒投降反共分子之手，实毫无疑问；奸人匪徒制造这种阴谋暴行，其目的是在企图恶化中央与地方之关系，破坏国内之团结，挑拨国共两党之关系，借此作为投降派分裂之口实，借此作为压迫共产党之口实。

证之事实，此次阴谋暴行之后，文化界救亡分子车耀先、唐医生等被捕矣，在成都之公开之共产党员罗世文、洪希宗等被捕矣，成都新华日报分销处被搜查，时事新刊被查封，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被枪决，凡此种种种一一出自奸人匪徒之有计划的阴谋行动，亦属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坚决抗议奸人匪徒所组织之阴谋活动，要求中央政府立刻彻底严查此次奸人匪徒之行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分子。

奸人匪徒，企图以卑鄙之行为，拙劣之技术，掩盖天下人耳目，而成都全体市民在街谈巷议，茶楼酒店谈论此次阴谋之来自何方矣。因为事实总是事实，谣言总是谣言，谣言决不能掩盖事实。惟恐阴谋谣传，外间莫明真象，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兹特郑重宣言，昭告全市同胞以成都抢米案之真象。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坚决相信：在我们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坚持我们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定能打破日寇汉奸投降反共分子的一切阴谋。

同时，我们也相信，中央政府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定能彻底查办，在国民政府青天白日之下，在蒋主席亲自领导下的成都所发生的成都抢米阴谋案件。

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档案）

邹风平给南方局的报告（节录）

（1940年4月12日）

.....

（四）群众工作

.....

今年春荒在农村中成为严重问题，特别在旧历3、4、5等月为严重时期，若3月不涨水，插秧无望，情形当更为严重。特委几度讨论这个问题，若不领导群众斗争，恐会脱离群众，群众也许会自动斗争，会惹更大的乱子；若领导会成为敌党袭击的机会，更要顾虑到国民党会乘机制造事件。

此间尚未得出结论，而成都事件即发生，这问题以后仍然严重的存在。

（五）对“三·一六”突然事变的应付
事变的经过，几度报告，此处不再谈了。

事变后两天，特委作了如下决定：

国际反苏阵线因苏芬和约的釜底抽薪而使其不成功，欧战有继续实行打下去的可能，英法无法压迫日本修改大陆政策以谋中日妥协，美国因威尔斯到欧之一无所获亦无法压迫日本就九国公约范围，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找英美为唯一〔一〕靠山，因此由第三者来调停谋妥协的道路很困难。日本虽急欲结束中日战争，但引诱今政府到彻底投降的道路，其中〔有〕条件上的困难，因此索性将汪逆推上台，相反的逼使政府更难妥协，非抗战无法下台。

对内方面虽然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后，反共浪潮与行动达到了统战中的高度，而对我党实际的削弱则并无什么，虽然打击了抗战的地方力量（晋、桂），也根本无法消除抗战力量。在财政上陷〔陷〕于极度困难，在未找到国际可靠支柱时，更不敢不亲苏抗战。所持而不恐敢于倒行逆施者，有二百万以上的军队。但这军队可就两方面来看：一、财政无绝对办法，军队即无把握；二、今天的军队比内战时的军〔队〕有这些不同：（1）绝对多数是穿军服的农民，素质纯朴，民众气习很厚，不是〔具〕有成见的东西；（2）是受的抗战教育，与内战时深刻的反共教育不同，至少在士兵中公开的是抗战教育，在干部中是抗战与反共混和的教育；（3）战斗的锻炼是抗战的，不是反共的，给予参战的广大士兵与下级干部生活上以光荣深刻的印迹；（4）与民众相当接

近，受的感染不同，要将此种军队陡然掉转枪口，不但困难，而且〕是自杀政策。

〔对于〕全国民众的抗敌情绪，虽然〔该党〕企图在反共、反民主、反抗战力量、反进步的一切倒行逆施中拖疲，以便投降分裂，但事实恰与此相反，一面是仇视他们，一面是要抗战。

在这些条件下，因此不敢整个分裂，但因为党采取较强较硬的态度，特别在战区表现更强，它必然要在大后方对赤手空拳的党来一个袭击。

在四川试探了地方态度，与我们并不如何亲密，仍然可以威胁利诱。

成都事件遂由此突然爆发了。

〔由〕此地更会波及到各县，由此时更会延长到将来，两年历史告诉我们，摩擦是向上的。

特委在组织上立即：

（一）关于特委本身

1. 缩小会议范围，缩短会议时间；
2. 将各机关搬迁，借疏散陆续下乡；
3. 立即缩小各机关，已裁撤青委、妇委、工委。

（二）关于成华的

1. 以断然手段立即疏散红色分子——A、实行到工厂到农村，B、利用自己社会关系找外地职业，C、分派各地工作，D、外省人及不便分派者送南方局。

2. 一样缩小会议；

3. 将各区之上组织〔一〕成都市委来领导，特委住一人在城内经常领导市委；

4. 严格检查，注意秘密技术，准备随时〔应付〕发生问题。

（三）关于各地方

康即派人到各地传达这个决定：

号召各级党正确认识这次事变，坚决反对张皇〔惶〕失措，准备突然事件的到来，研究今后工作的办法。

事变在党内的反映：

张皇〔惶〕失措的太多了，有的藏在屋内简直不敢出街，一般的把书报烧了，有的寝食不安。在我起身时，支部同志还并不觉得怎样，一方由于他们不红，一方由于认识模糊吧！

没有经过战斗的党，在这次把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也是一个大的教训。

其他地方尚未得到反映。

（原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

川康特委报告书（节录）
——1937年至1940年7月
（1940年8月20日）

……

第一 川康党的发展过程

……

（3）发展的经过

.....

第四时期、巩固时期（1939年9月至1940年的今天）

在前一时期，王治易为复兴社作工具，由代主席而真主席，终日骂共产党，执行复兴社一切办法，为国民党在政权、军队、经济、文化、党务、特务各方面的发展开辟一条道路。但复兴社是以王治易为过渡，同时王又遭四川地方的猛烈反对，于是下台。川主席问题又大闹一时，结果由蒋自兼，抵挡了一切争夺而以成都行辕主任省府秘书长贺国光代理主席，从此蒋中央把四川政权拿下来了。各厅处皆用复、C或接近复、C人物，除保安处外，省政府内部是清一色的蒋势力，而与川康绥署邓系、川陕鄂边区绥署潘文华及地方其他势力处于极端对立地位。

国民党六中全会后，又来了共产〔党〕问题处理方案和处治共党问题实施办法，在华北是大规模的军〔队〕向八路军进攻，山西又闹新旧军冲突，新四军亦被进攻，陇东事件亦异常严重，各地捕杀共党事层出不穷，投降分裂的危机迫在目前。重庆成为和平空气、反共空气的大本营，特务人员在旅馆、茶馆、车站、大街、公园终日侦候着，前进书店的书时常被没收，所有前进的刊物报纸都被取消，地方势力既不敢进步又拿不出一套对付的办法而日见削弱着，党是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情况下了。

八月中罗世文同志由南方局回成都传达中央决定，特委开全委会听他的报告，又讨论两天。

政治各问题我且从略。

中央对大后方的党只有一个最中心的任务：“停止党的发展，以全力巩固党的组织，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

来。”“若必须发展的地区，亦非经南方局批准不得发展。”
特委接受这个决定。

.....

第六 教育宣传工作

.....

七、《时事新刊》：在抗战初期，成都先进记者与一部分党的同志自己组成一种刊物，每日发行一小张，内容前进，文字短小精悍，青记总会称为全国小报的最成功者。编辑本身只有饭吃，无薪俸，一味苦干，由于内中两位编辑是成都第一流乃至第一二位的记者（一为党员，一为同情人，邓锡侯每周约秘密谈话两次，分析时事），因此支持下来，销数达六七千份，经常保持四千余份，只邮政检查扯拐，使读者不能满足，顽固分子无法封闭（合法的），每日由新闻检查所找麻烦，又派人坐在报社内监视。抢米阴谋爆发当晚，即将该社由编辑到工人全体拘捕，幸主要人物未在社，脱逃，而编辑兼翻译朱亚凡同志被枪决，《时事新刊》亦被永远查封。

.....

最后关于新华报成都推销的情形：

1938年春天，成都即将《新华日报》推销处设立起来，长江局责成四川党负责办理。开始是邮寄报在成都来发行，武汉撤退后，即航寄纸型在成都翻印，由于时局转好、党的加紧推销，在川西北各地发行到1600余份。因邮政的扣留，使读者出了钱经常读不到报，以及各学校公开的禁止学生读新华报，于是逐渐减到一千三四至一千上下，一千上下的数

日一直维持到今年。但我们检查读者的数目，却反比以前增〔加〕，在学生中有一份报读至30个人的，成都市及其附近许多读者要求不必由报丁送及邮寄，他们每隔数日或星期直到报社去取，秘密地读着。至抢米阴谋爆发，罗世文同志及报馆经理洪希宗同志被捕，并没收订报名册（幸好事先已嘱报社另造一份假名单，实际订户册则秘存别处，拿去的是假的）及存款百余元，报社及发行大受影响。同时又勒令成都各印刷厂不得翻印新华报，我们只好从邮政寄报到成都再发行，又于渝蓉寄递中经常捣鬼，务必使之延期，于是销数减少到四百余份。

在报馆附带所卖解放社、中国出版社的书籍，亦常被没收。

现在报馆内部缩减人数，缩减开支，不设经理，组织三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特委在一定时间同管理委员会接头。①

.....

第九 各地党的破坏情形

（一）在抢米阴谋以前的

（1）名山特支书记王广义同志，在名山中学教书，学问好，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甚至与学生同伙食（在四川教员与学生同食是绝无其事的），同游戏，在学生中威信甚高，党的发展亦较速，影响特别大。在作风上暴露，引起了校内外的谣言。第二学期，校中青年党大贴标语反共骂王，引起学生愤怒，联名告校长（青年党人），王为学生拟呈

①原件此段后面有中央批注的“最好不接头，因既危险，又无必要。”

文。校长与县长勾结，搜王同志寝室将党员须知及王拟的告校长的呈文底稿搜得，将王同志、学生同志3人逮捕拘于县府。王对县长不满意，当面责备，不承认自己是党员，〔说〕党员须知为友人赠送，现友已到华北前线。王同志与地〔方〕绅士关系很好，加以他以大无畏精〔神〕责骂县长并及贪污各情，颇得地方人士同情，当地驻军〔川军〕某营对王更表同情，劝其硬干，县长又托人来向王疏通，准备和解，王不答应并控告县长于省府、行辕，事情弄成僵局。已由地方保释，而又被拘押，结果是由周恩来同志拍电释放的。王同志只是技术上差点，他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是值得夸赞的，在名山引起了很大的好评。

（2）自井谢长琮同志以青年学生下层化，入厂作盐工工作，在开会时被捕，事先工人有反对兵役不均的斗争，被捕后无社会关系，并不重要文件，他承认是党员，公开与警察局作政治斗争，引起全自贡皆知其事。党动员上层关系在绅士〔中〕活动，结果他们向当局提出“蒋委员长与周恩来在一起共办国事，共同抗日，而自井发生这样的事，国家分裂内乱的事，自井怎敢负责！”要求释放，谢同志亦激烈斗争，约十日无条件释放。

（3）成都群力社，无原无故被王治易（王当时当川主席欲向蒋献功）拘捕三人，内有学生工人，记者1人（董少敏），无任何证据，有社会关系，群力社亦系初期合法团体，虽然已登记，不承认合法，然而百分之百的公开的救亡团体，三同志在狱坚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态度亦温文尔雅，后由地方关系活动保释。

（4）西康的汉源县，地方小，偏僻落后。当地有旧同

志3人，抗战以来与党发生了关系，在当地发展组〔织〕有20余人。后派有外地干部刘蜀萍同志去工作，掩护技术不好，被当地保安队认为是贩鸦片的而搜查，搜出文件及通信处，接连逮捕日常往来者4、5人，内中有农民新党员，经威吓供出多人，前后被捕10余人。是案发生适王明、林老、吴老到延经成都与刘文辉往来，虽未谈此事而感情关系又较深一点。刘蜀萍同志与之作政治斗争，不屈不挠，当地国民党县党部立主将刘蜀萍解该省党部，汉源县府不准，电刘文辉请示，刘回电云，“只要共产党无妨害于西康，可斟酌办理”等等，结果将刘蜀萍同志释放，但不许逗留西康。汉源组织从此倒台。

（5）资中是中心地方而我党的组织甚小，派安徽人于中去工作，被特〔务〕追逐被捕，搜出联共党史及日记，于中承认为本党党员，开始表现很好，县长××××后盛称为好青年（于与其父用英文通信为县长知道），××讲忘年交，请吃东西，送东西，用尽一切收买欺骗办法嘱写悔过书以解县长的困难。余〔于〕以气节问题为难，彼云，不马上写些也无法应付上峰，并说他同罗世文同志是好友，此事已同罗商量过，保证于能回到本党来无问题，并对悔过书保证秘密，于被骗写了悔过书出狱，尚不知为自首叛变，高兴回成都。后开除其党籍，嘱其仍去住大学，现在复旦大学快要毕业，与风平有通信关系。

汉源、资中的破坏得出如下经验：

组织太小，无适当职业，不能派中心干部去。干部地方化最为重要，特别小地方。

（二）抢米事件及以后的破坏

(1) 抢米阴谋 成都在3月8日以前，米价每市斗4元半至5元，8号以后有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军政部囤军米，中央军校及各银行以及地方的投机操纵者在四五日之内将成都附近各县存米收买一空（以交易所的办法新兴仓飞制度，非常便于操纵），米价每市斗涨至8元多，城乡民众大哗，途中发生个别抢米破口袋等事（川西历史传统凡遇灾荒照例破米袋抢米）。3月14日午后8时，有武装便衣300余人，军裤亦未换掉，集合于成都新西门外，先将商人米店捣毁，后到天竺街（黄门街）将潘文华的重庆银行仓库捣毁，又到龙王井将四川省银行仓库捣毁，中中交仓库丝毫未动。乱事一起，贫民集而抢米者约千人，该乱党沿途高呼“实行阶级斗争”，“打倒资本家”等口号，警察武装束手旁观（警察局长唐毅，复兴分子），闹至12时始散，顺便将《时事新刊》人员捕去，当晚12时即通知〔各〕报不得登载是项消息。

15日晨，贺国光召集成都党政军联席会议，将伪造的共产党文件宣布，内容是上级党训令四川共党：

- 一、扩大100万党员；
- 二、组织10万红军；
- 三、实行春荒暴动；
- 四、推翻现政府。

共计5^①大项，说抢米是春荒暴动的开始，主张严办。邓潘亦出席，邓未发言，潘赞成严办。

15日晨我们得到抢米消息，当即开会讨论，以为有阴

^①原文如此。

谋，须详细调查。午后更知道一些材料，接头会议肯定为阴谋，宜紧急防备。当晚即通知各上层红色注目分子，如张秀蜀同志等立即避开，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满不在意，罗更来责备特委张皇〔惶〕、不镇静，争论半小时出特委机关，到新华报不到5分钟为特务队架去；车耀先同志更向新华报问情况，立即又将车捕去。接着将大声社的唐医生同志，星芒通讯社的同志，潘部的郭秉毅同志，邓部的汪导予（同情人），生活书店经理、店员，新华报经理洪希宗同志（因捕邹风平未获，因而捕洪），先后捕去10余人。22日遂将朱亚凡同志以聚众扰乱后方而枪决，由行辕、省府、绥署联署宣布罪状，而绥署未过关防（后闻邓对枪毙朱亚凡同志迟疑一小时始签，而不过印），邓对亲近我党者说，牺牲朱一人以救大众，他很难处，请原谅。在十八九两日我们已将此阴谋传达于武德学友会及潘的干部中，潘的干部力向潘解释此阴谋，抢地方米而不抢中央米，是复兴〔社〕试探地方态度，打击共产党是第一步，对地方是第二步，潘始而缄默，继而因郭秉毅、汪导予被捕始大醒悟。邓、潘干部要求保障，否则辞职，邓潘才提出以后遇有事件要经行辕、省府、绥署、警备司令部（地方的）的同意才能捕人，不能秘行拘捕，贺国光亦同意，情形稍和缓，但被捕的人，除《时事新刊》的人以外，均杳无消息。《时事新刊》的工作人员党员与〔非〕党员后由邓要到绥署拘押，经一段时间各取保释放。

这个事变发生后，成都党大大震恐，一时张皇〔惶〕失措的现象有普遍性的蔓延、个别的典型的例子。有请求退出的2人（均大学生），有秘密迁居组织不知道的，有终日藏在家中不敢出门的。但见着特委同志仍然在积极活动，传达

对这次事变的认识与应付办法后，情绪即提起来了。

特委对这事变的认识与应付办法：

从国际国内形势看来，直接投降妥协还不可能，因此整个的国共破裂亦不可能，这是整个摩擦事件中的一个事件。

就四川而言，为了解决地方势力，而认我们为地方势力的支持者，这次事变是对我党与地方双管齐下的办法，而侧重于我党，对地方是打击与试探的作用，对我们是开始大规模的进攻，成都是第一炮，迅速即会波及于各地方党。

我们首先拉拢地方，尽量说明这种阴谋的企图，使地方内部团结起来对付他们，我们在组织上施行紧急办法应付这个事变及其蔓延。

一、立即通知成都党全部戒备，好好收藏文件，准备社会关系与口供。

二、会议范围缩小，至多以3人为限，时间至长不得超过两小时，每周会议一次，临时事件2人接头处理。

三、紧缩各机关，将青委妇委撤销，所属各组织交成都地方分别管理。

四、加紧疏散红色分子：

A、好干部深入下层，分别派各地方工作。

B、不适于地方工作的送南方局分配。

C、尽量到外县找职业。

D、移乡间暂避，听候分配。

五、将这次事变的经过认识与应付办法，用书面及口头（要派若多干部到地方工作）的传达各中心县市委，嘱其照办，准备应付紧急事变的很快到来。

在政治教育及党的教育上，坚决的要认识这是摩擦之一

而非整个破裂，坚决反对张皇〔惶〕失措，动摇悲观，必要时洗刷动摇分子出党。

（上面这些，我4月间在南方局的书面报告写得比较详细，并于该总报告〔中〕还有几个临时报告，听说那个报告已经带到中央来了，请参看。）

照这样办理下去，组织上倒无其他问题，在政治上却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阴谋没有公开揭穿，张老同邹风平曾一再提出，并每人拟了一个宣言交常委审查。关于发公开宣言揭穿是认为必要的，只是用什么名义的问题，张邹两人均不拟用党的名义，因抗战以来川党从未公开过名义，拟〔以〕民众团体名义发出。稿件两份交去，常委未通过^①，因此又专人到南〔方〕局请示，限一星期返蓉。等专人回蓉，南〔方〕局已将宣言拟就用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发出，南〔方〕局说内容的事实可由特委斟酌，听取传达的郑同志在常会上报告却弄不清，而说南〔方〕局说发与不发由特委斟酌，并说发了即准备挨打，发后即停止组织活动一星期，静候消息。结果常会决议不发，认为政治上胜利而组织上遭受大破坏，并是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等同志生命攸关，况且口头上传达已普〔及〕各地方党了。接着邹风平到南方局，才知道南〔方〕局决定要发，并已拟就准成渝两地同时散发，是晚即决定第二〔日〕派与风平同时到渝的杨同志于次日飞蓉，限于杨抵蓉之第二日发出。特委是按时发出了，将宣言的日期提前为3月24日。

在一夜工夫，成都党整个动员发遍了各机关团体（许多

^①此处有程子健批注：“与事实不合，发宣言主张系常委向南〔方〕局提出的。”

用邮寄)、街道及附近各农村疏散区,博得地方势力及中立人士的极大赞赏,他们久要说的话不敢说,是被我党说出了,特别是武德学友会最为努力,将我们的宣言普遍传观。特务阴谋在成都的准备继续爆发,倒因此而受到打击与阻止,对党内的情绪的提高与巩固亦有绝大作用。一个有趣的例子:华西大学三青团分子当众宣说:“共产党公开反对政府,明知抢米事件是政府干的而说是奸人匪徒,简直骂政府是奸人匪徒……”引起全校哄然,传遍一时。

由这次事变证明,特委在紧急事变中政治上的把握是不够的,特别是邹风平如要坚决散发亦是可能,而邹因把握不住,结果是同意其他同志,致使散发时间延长,减少了政治作用。

(原文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

张曙时给中央统战部的报告(节录) ——川康特委统战工作 (1940年12月10日)

.....

一、四川政治形势的演变(1935年起至今日)

.....

9.刘〔湘〕死后的川局

刘死后四川缺乏中心人物,左派分子更与我们接近,将核心社改组为武德学友会,作为团结川军的机构,扩充干部

成立干部会，继承刘的遗志，抗日反法西斯。而邓汉祥走何应钦的路线，企图继刘主持省政；潘文华、邓锡侯、王缙绪、唐式遵皆争长川政，内部因此分裂。在各派角逐之际，各不相下，中央委张群来主川政的命令发表了。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内部不团结的危险，正予中央以拿四川的好机会，而且张群有亲日派的嫌疑，是政学系的分子，一定要反对张群，才能巩固四川人之四川，由四川将〔领〕中提出二三人来，请中央择一任命，不要自己各争政权，以至分裂，那么四川将来就被各个击破，虽想维持现状亦不可得。他们接受这个意见，一致反对张群，提出人〔选〕请中央任命。绅士阶级如方旭、尹仲锡及民众方面多数反对亲日派张群来主川，请中央收回成命。而狡猾的王缙绪，就在这反张运动激烈时期，投到复兴社——康泽的怀抱中，而得主川政了。一般人认王“卖川求荣”，刘系统因此而分化，引起潘、王的斗争。中央势力因王缙绪主川而扩大与深入。复兴社的干部会议王也参加。王恃有中央的靠山，蛮横无理，不仅执行复兴社命令而反共，并且反对任何川军中的同事，激起邓、潘、刘大团结，及全川人民的反对，而七师〔长〕通电反王的大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们暗中支持着，不提出什么具体意见，而采取明守暗攻的政策，以防复兴社挑拨离间借口来反共。王虽有复兴在极力撑腰，也无法稳固其地位。蒋为缓和四川军人激烈斗争，及吞蚀四川政权起见，遂自行发表自己兼代四川主席，固然引起川人的大大不满，中央与地方矛盾更加尖锐，而反王运动从此告一结束。

10. 蒋兼主席以后起了很大的变化

自国府迁川以来，政府机构大员大批到四川来，地主资

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与难民，成千成万的跟到四川来。各党各派皆到四川做中心地带以谋发展，大小工业皆来这个地方谋开发，不特人口增加了很多的数字，经济上也起了很大的波动，物价逐渐飞涨，纸币逐渐低落，商业市场上呈现一种不规律的膨胀现象，大资产阶级及中小资产阶级因此就发了国难财，一般的贫苦民众因生活不平衡的发展而叫苦连天。蒋兼主席不特不能得川人的欢迎，转使川人大为愤恨。由于中央势力的扩大与深入，迫使川人大团结（邓、潘、刘大团结）而谋反抗。中央统制丝、糖、盐，引起丝、糖、盐各商帮大团结而反抗。中、中、交、农四银行的大批囤积居奇，把粮价抬高，使民众愤恨更深。而且教育统制，民众团体包办，舆论封锁，征兵不公平，中央机关人员与军队欺侮商民等等行为，造成了四川人与下江人的仇恨与对立，在四川无论何地上中下层的人们中间，皆可听到反中央的呼声。至于反共防共诬共的杀人放火的事件，〔以〕更层见迭出的烟幕弹来欺骗民众，企图向我党进攻。到今年3月14日，由复兴社所制造的“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大批捕杀我们同志及同情分子，并将武德学友会的秘书长汪导予也捕去，使地方势力派更了解打击共产党即打击地方势力的阴谋，使邓、潘部下受这恐怖所威胁，由中层干部力逼上层加紧团结，制止复兴社顽固分子的暴行，大会议^①提出与行营〔辕〕主任、国民党省党部交涉，非经四个机关共同签字（即省府、绥署、党部、警备部）不准乱捕人之决定，并有向中央索回四川政权之提议。虽然没有将

^①原文如此。

政权要到川人手中，地方与中央势力演成势不两立的严重现象，如周、刘、彭几个师长说：“不将中央力量打击出去，就有亡川之苦痛，我们受不了压迫，干吧”！于此可见其一般了。

……

三、在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

3. 第三阶级 1939——1940年。自蒋介石兼省主席，这时候有哪些特点呢？

a. 地方势力受压迫，而反中央的浪潮尖锐化。

b. 中央势力深入到军、政、党、财政、经济及教育、文化、民众的一切统制制度上。

c. 民众对中央不满的愤恨普遍到各阶层，并且因汪精卫投降而不信任国民党能坚持抗日主张，这是到任何地方皆可听到的舆论。

这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争取与团结中间及民众势力，坚持民主与抗战，利用地方势力打击反共妥协的特务势力。在埋头苦干的地下党时代，利用群众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来掩护与发展工作，积蓄力量，准备将来。

进步的群众团体如星芒、群力、妇抗，皆成了赤色团体，没法活动了。原来这些团体的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员，未能吸收广大群众到里边去，而领导这些群众活动的有些左倾关门主义，及到需要利用公开合法的团体去掩护与活动时，大多数的新的党员每多喜欢把红色面孔露在人们面前，表示不如此不算进步分子，无法打入到公开合法的群众

团体去，即有可能的也是极少数，即有些分子在群众中得着相当信仰，可是因红色关系，也不能起广大的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更很难说到下层工作与上层相配合。如印刷工会在成都工人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有群众，有较多的党员，就是因为我們人太多，有力量，合法的工会筹备处国民党部因无法控制，拖一年而不正式成立工会。印刷工会受黄色工会的捣乱与特务分子收买与破坏，就不能起相当大的作用了，只有航空机械班与工厂加薪运动上，采取工人与职员全体签名请求的办法上，得着相当的胜利。因为这一运动是职员与工人切身关系——生活逼迫着，我们同志在中间人数只占百分之一二，完全利用群众的要求，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全体的同意，绝不露赤色面孔，使他们当局无法用高压手段来镇压。

在文化座谈会、宪政座谈会，尽量提出民主与抗战、团结与进步的问题鼓动群众的热情，并且与地方势力潘、邓系统的人联络起来，每次会要他们来参加，由他们的下层推动邓、潘团结，主张民主与抗战，不反共。可是，由于反共的势力借着政权顺利条件，又有党政军警的一致，地方势力派在他们反共派企图^①制造谣言欺骗之下，不能与我們有很好的密切联系。如反共特务分子在放火案子上（成都中学、蜀华中学、川大、协和医院等放火案），皆诬赖在共产党身上，地方势力派采取疑信参半态度。在这放火案件发生时，我们估计到是制造更大的反共惨案之到来的预备。我们有些同志警惕性不够，不能适当的布置，一方面尽量向群众揭穿

^①“企图”二字是衍文。

反共特务派的阴谋，一方面应严密我们组织与埋藏工作。可是一些人担心的〔而〕不事先预防，及至3月14日“抢米事件”发生，就来一个大捕杀。如罗世文同志，在前三天我曾对他说不要每日按时到报馆去，而且我说明康泽到成都来了，一定是来布置什么反共新事件，他不注意这些话，就〔在〕第三天被捕了。

及至抢米事件发生后，我主张发表宣言，揭穿反共特务的阴谋，给社会人士以一个认识，这也是打击反共派一种办法，而有些同志不赞成这个办法，并需要请示南方局才好。结果晚了多少天，仍由南方局主张〔发〕宣言才对。

这不能不说是在有利条件时候，对于打击反共特务派的工作做的不够，而且在各工作部门上不能配合，及至事件到来，表示仓皇〔惶〕，而又不能适当的应付，这适足以增反共派的气焰，而馁同情者与中间派帮助我们的热忱，也算是很大的损失吧！

（原文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

周恩来致张冲的信 （1940年12月21日）

淮南先生勋鉴：

承面示关于参政会下届人选问题，甚感。惟叶青与张国焘无丝毫差别，且张之破坏团结过于叶青，而其罪直等于陈炯明之于贵党。犹忆当年蒋先生因陈炯明辱及贵党，诬及孙先生，不惜绝裾而下。此等民族气节，正弟等所愿谨效法者

也。故张国焘虽属江西选出，但为党部所指定，解铃系铃，权在中央。苟为下届参政会示团结，弟敢请兄以弟意转呈委座，当必能蒙俯允也。

又，最近各地反共事件纷起，其目的显欲逼成事变，兹择要告兄数事如下：

一、现在璧山附近，中央机关已发现有“防共即是救国”标语，闻其指令系出自中央党部。

二、《新华日报》被扣被删之稿件、文句，常至极无理地步，如本月7号中苏文化协会之妇女晚会特写上“团结打日寇，团结打汉奸”字句，亦被删去。

三、第十八集团军委原驻蓉代表罗世文前为抢米案所陷害，被特务机关捕去。现闻已与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负责人车耀先先生同时被杀。

四、目前，大后方如川、黔、湘、鄂、赣、皖、陕、甘等省，捕杀中共党员及所谓可疑之抗战分子，日有所闻，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清洗异党分子更弄得人心惶惶。

五、第十八集团军驻秋林二战区之联络处王世英参谋及其处内人员十余人，全数被中央军六十一师派兵捕去。经交涉结果，该师声明捕王系误会，但联络处人员仍未释放。

六、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联络处，主要在担任采办运输中所需补充之交通、卫生器材，但最近为军政部驻桂办事处威胁撤销，限期结束。

七、第十八集团由西安赴延安、绥德之军车及其所载之人员、资材，常被无故扣留、拘捕。最近且闻西安特务机关规定办法多种，专门为难十八集团军之交通运输，使其人员、资材无法补充和转移。

类此事件，多至不可胜数。弟等为团结计，殊不欲扩大范围，但愿其早日归于平息。惟日前最严重之事件，莫过于新四军江南部队已整装上道，而一切补给犹无着落，新四军、八路军在江北部队已听命停止冲突，而山东之东北军、安徽之广西军犹向之着着进逼。其尤甚者，则为李鹤龄主席所指挥之两个师已越淮南而东，新四军支队东退，彼竟直逼滁县，并在该处设立“剿共”司令部，是李主席直欲切断新四军大江南北之联络，并与江苏方面友军配合，造成对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之半包围的形势，直逼之于江海之滨，尚有何渡江北移之可能？另一方面，重庆若干报纸已奉命公开反共，而《商务日报》更公开掲載所谓中共脱党分子之宣言，以示挑衅。似此举动，其目的绝不仅限于执行军纪，其意图必更另有所在，纵弟团结有心，亦极难作适宜之解释也。素信先生坚持团结，想对此严重现象，必有以和缓而调解之道。弟信笔直书，亦唯望先生能转呈委座之前，而求得其平，殊不胜企盼之至。专此。敬颂。

勋祺！

弟 周恩来启

12月21日

（原载《周恩来书信集》）

程子健在延安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年来川康政治形势与党的工作
(1941年8月29日)

一、国民党三次反共与党化川康政策加紧

去年3月14日成都抢米事件以后，川康特委认为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以川康为反共根据地，因此，在全国反共高潮到来，川康必然到来，全国反共高潮低落，川康不一定低落。一年以来三次反共形势，证明这一分析完全正确。特委又认为在矛盾复杂的川康，国民党反共基本方针是壮大自己，加强反共力量，压迫地方实力派反共，特别是加强内线政策。一年来反共不平衡发展，亦证明这一估计完全不错。

在第一次全国反共潮流高涨当中，在川康宪政运动顽强地深入和开展当中，不可避免地国民党要在川康发动第一次反共。同时在地方实力派对反共均无兴趣，中共尚未取得川康治安权力，一般人民不同情反共情况之下，国民党在川康采取希特勒火烧国会自买自卖政策，以抢米骚扰造成反共舆论，离间地方实力派与本党关系，压迫地方反共，削弱地方权力。其阴谋，其奸计，虽然被川康特委在南方局领导之下完全揭穿，甚至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亦逼得不能不打自己嘴巴，在口中申明说：“亦不是共产党抢米，亦不是国民党抢米，而是好人匪徒干的。”可是由于个别干部一时麻木，如罗世文、车耀先、朱亚凡等同志，以为抢米是一般事件，以致被捕，以致牺牲。国民党基本上完成第一次反共目标，

破坏党在川康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削弱或摧毁党在合法非法团体中活动（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青记、宪政座谈会、东北救亡分会、文艺抗敌分会等），破坏成都、阆中、自贡、蓬溪部分组织及康定全部组织，共约捕去同志30人。同时由于邓锡侯、潘文华软弱，中央在成都和阆中借反共威吓，争取了部分治安权力——建立了川康党政军联席会议，领导反共，虽然决定逮捕共党最后要经过绥靖主任邓锡侯批准，可是中央在联席会议取得了三分之二议席（省主席与党主委），并且中央从来亦不讲信义，在会议上欺骗恐吓如不成功，必要时亦可不待邓锡侯批准便逮捕共产党。到了6月，全国反共潮流虽然低落，可是在川康发生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由于国民党于3月14〔日〕以后，利用反攻余威，压迫地方实力派，蒋介石到成都强迫抽调川军三师出川，企图夺取保安处，引起川军一致抵制，地方实力派进而利用滇缅公路封锁以后，国民党处在进退维谷之际，向中共反攻，国民党采取杀鸡给狗看，釜底抽薪策略，在成都、嘉定逮捕共党，以威吓地方让步。由于个别党部、个别同志不警觉，如嘉定中心县委得着情报，嘉定要逮捕共党，还不相信，成都个别红色干部已决定疏散，迟迟不走，结果被捕去武大、川大、华大、光大以及文化干部十儿人。虽然如此，地方实力派仍然积极要求争回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央与地方军队八九月在成都警戒森严。国民党乃大肆造谣：“八路军已到天回镇（离成都20里），朱德同邓锡侯在春熙路走，朱德要当省政府主席、毛泽东要当外交部长”，企图造成反共舆论，缓和地方反攻。后来川康特委翻印去年中央纪念七七宣言，揭穿国民党顽固派无耻造谣，加以苏北黄桥摩擦军失

败，以致当时尚未发生逮捕共党事情。

国民党顽固派虽然以反共威吓地方，但是地方实力派仍然继续对中央强硬。张群上台不打贺电、不开欢迎会；中央又以武力为后盾，派兵企图侵占川军在泸州附近某处据点，以压迫地方共同反共。11月军委会、政治部、教育部派大员3人到成都召集中级以上国民党校长教职员联合会，宣布反共为今后教育主要任务。军委会代表说：“共产党在法律上不存在，因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没有各党各派一条；共产党在理论上不存在，因为共党已于1937年×月宣称愿为三民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共产党在政治上不存在，因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共产党在军事上不存在，是为奸党，今后办学当以肃清奸党为急务……”各校长教员相视无言，只有省立师范校长陈行可（乡村建设派）起来发言：“请上级注意！考虑！中国是多神教国家呵！”以后那三位大员又分赴各重要城市讲演反共。接着张群在四川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讲话：“你们出去当县长，尽管捉奸杀共，先斩后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走漏一个。”接着黄季陆在某次群众大会讲演：“法国亡国，亡于共党在后方捣乱、罢工、破坏国防……”省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长何培云（特务头子），在党员活动分子会上报告：“每个党员任务侦查共产党，如果在朋友中查不着，就在你亲戚家庭中侦查，否则在同志中侦查。”绥署特别党部告诉党员，打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12月中戴笠率领中央特务团来省，反共形势更加紧张，特委立刻通知同志警戒，减少联络，减少会议，不隐〔蔽〕机关及红色分子迁移。果然，在茂林事变前后十几天，特务团在成都捉去黄梦谷同志及王梅影等，阆中

一带捉人最多，苍溪前县委委员潘式之、杨伯刚，党员蔡大元、王××、陶茂新及群众李校长等十余人被捕，阆中河淇〔溪〕观捉去同志十余人，城内捉去两个学生同志，剑阁师范捉去学生同志几人，苍溪杨勋及阆中两个学生同志在威吓之下自动自首。三台、绵阳方面捉去同志十余人，内江捉去同志2人、群众十人，威远捉去同志2人，富顺县关城清查，一无所获，自井捉去同志1人，荣县捉去群众几人。共计捕去同志40余人，群众二三百人。

三次反共经过当中，国民党反共力量大大增加，反共方法愈加毒辣〔辣〕。主要是：

1.反共领导机关更加强火。去年11月川康党政军联席会改组为川康党政军警宪学联席会，中央议席由原来三分之二取得六分之五，并且军警宪随时可以搜查或逮捕居民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者。

2.扩大特务网，深入乡村。国民党部、三青团部动员党员团员做特务工作；省政府、行辕、绥署、特别党部动员各级政权及军警清查共党，组织巡逻队，配合特务人员工作；各种各样化装侦缉员，普遍在成都、自井及其〔他〕中心城市活动；乡村每保指定两个通信员，随时报告乡村有无共党活动。

3.派遣内奸，活动内线。顽固派曾派奸细打入朝大、戏专、川陕鄂边区绥署组织，曾在生活书店、读书生活书店、阆中河淇〔溪〕观等地组织收买同志，建立内线。不过无论是由外面混入的，或者由内面建立的内奸，一般是性急，开始就破坏，所以很快就暴露。同时又看出从内面建立的内奸破坏作用大，但不及从外面混入的坚决。

4.二十四小时解决。即是对被捕共产党员采取闪击战，一开始使用最大威吓迫其自首叛变，放回组织作内线，愈快愈好，最好几分钟十几分钟便解决。如闪击不成功再用各种方法动摇之，务达自首叛变目的。

5.合理流言。在反共行动之先，配一套合理流言，说得有头有尾，似是而非，不是说“八路军已到成都，要夺政权”，便说“共党烧房子，抢米粮，要暴动”，以造成反共舆论。

6.自买自卖污蔑共产党。去年3月14日抢米，烧成都中学、蜀华中学（未烧成），烧四圣祠女医院、东外平民疏散宅，今年三四月烧南薰中学及文华小学（青羊宫）等，烧了以后又造谣“共党放火”。

在反共逆流当中，川康实力派及各阶层的态度，究竟怎样呢？

1.地方实力派。虽然在皖南事变反共高压之下，地方实力派一般在口头上亦要讲讲反共，但在基本上仍然是反共怠工。刘文辉去年6月放了行辕在康定逮捕的共党及嫌疑分子十余人（在雅安路上放的）；刘树成、周成虎不逮捕共党，或者先打通知然后去假捕，就是行辕派人去逮捕的，他亦不办；邓锡侯在中央威吓之下多少执行一些，比如去年6月中央要捕三百几，他批三十几，做了之后又向我党及进步人士表示歉意；潘文华对反共无兴趣，不过为人软弱，所以在阆中破坏更多；邓潘部下，特别是彭光汉、李树华等，对反共大有唇亡齿寒之感，对反共更是怠工，并且对中央反共反地方一箭双雕政策行动颇能给以积极反击。

2.地主阶级。在政治向上时候，一般开明的地主在舆论

上支持国共合作，如1939苍溪某地主在茶馆谈天说：“敌机轰炸，还分什么党派！国共两党的血，流在一处，分不清楚。”另一个地主说：“分得清楚，炸死的人，血是酸的，那是读书人；血是咸的，那是工人；血是青草臭的，那是农人；血是铜锈气的那是商人；血是黑的，那是国民党；血是红的，那是共产党。”从此可以看出有正义感绅士不满中央反共政策。以后在反共威吓高压之下，一般地主对反共仍然不以为意，但亦不敢反对反共，甚至有时被反共谣言欺骗，亦不免慌张，甚至个别地主为了避免家庭危险，压迫自己儿女反共。但是，地主一般对反共是中立态度。

3. 资产阶级。川康大资产阶级想着将来，对共党有些害怕，但在今天，在中央压抑之下，因利害关系，对反共漠视；中等资产阶级对反共中立，但利用反共逆流以加强对工人剥削。

4. 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反共，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不敢讲；下层小资产阶级，有时想着国共早点分裂，共产党早点来亦好，有时又失望，苦闷消沉。

5. 工人农民。听着八路军到四川，喜出望外，对于反共气愤，对于生活虽然特别感觉苦痛，但不明瞭这是由于反共逆流发展而加重生活困难。

总结起来，地方实力派对反共怠工，地主资产阶级中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不满。因此我们在川康反共高压之下，还有不少间隙可以利用防御反共，还有不少群众由于生活压榨，争取他们逐渐起来防御反共。

我们在川康对付反共的策略，又是怎样？在反共逆流一次更比一次剧烈当中，我们一时虽不能转变其方向，但我们

可能在巩固组织基础上采取适当防御策略，以阻碍其进行，减少党和革命的损失。一年来采取以下策略：

1. 利用中央与地方矛盾，启发地方实力派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情绪，揭破中央一箭双雕毒计，提高其警觉，争取其对反共怠工，敷衍塞责，阳奉阴违。

2. 正面或侧面揭破顽固派造谣污蔑自买自卖的阴谋，指出反共是投降妥协的步骤。

3. 分化顽固派，孤立死硬分子，削弱反共力量，采取各种各样间接方法打击。比如某校同志及群众突然将三青团某死硬分子蒙着眼睛打了一顿，使他挨了一顿黑打之后，以后不敢死硬等。

4. 隐蔽在反共旗帜下防御反共，比如加入国民党，大家说反共，同志亦口上附和反共以掩护自己。

5. 利用人民群众与顽固派亲日派矛盾，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在宣传上联系着暴露顽固派亲日派反共面目，丧失其威信。

……

（原文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

档案资料

省政府转饬调查车耀先 在蓉活动情形密令

字第0066号

令成都省会警察局

案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本年1月12日发渝俭文字第七四号密函开：

据报：共党车耀先在蓉活动情形（一）车与薛特恩（前共党成都市委书记，为理发工人出身。）等所主办之《星芒周刊》停刊后，现又创办《新生周报》，社址设祠堂街努力餐馆内。（二）组织抗敌歌咏团，下分抗一、抗二、抗三三大队，尽量吸收成都各阶层中之优秀分子。惟车本人对歌咏本属外行，故主要负责人为新由陕北抗大归来之学生张鹏举等语。除分函外，特此密达，即希查照，密切注意，等由。准此。除分令成都市政府，警备部知照外，合行令仰该局遵照，即便遴派干练精细人员，严密注意侦查该共党行动，并

将其活动情形随时详密具报，以凭核办为要。此令。

主 席 王 纘 绪

民国28年1月7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国民党四川视察员项学儒 向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文

案奉部令渝字第5285号代电嘱调查成都市文化界真实情况一案。学儒遵即一方面会同市党部详密调查；一方面督促省市党部发起组织成都市新闻记者协会，随时探听异党之消息并防止异党之活动，该会已于上月中旬成立，内部负责人大部系本党忠实同志。同时督促市党部在该会组织党团以为活动之核心，市党部正在办理中。兹将调查异党活动情形列表呈报。敬请鉴核

谨呈

中央社会部

附：异党活动团体调查表一份。

四川省第一区视察员

项学儒 谨呈

民国28年10月5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成都市文化界异党活动团体调查表

团体名称	负责人	地 址	是否备案	最近情况
四川省妇女 抗敌后援会	朱若华 贺敬轩	不 定	未	参加妇女工作
星 芒 社	徐天滔	不 详	未	发通讯稿，间出 壁报，言论左倾
大 声 社	车耀先	祠堂街努力餐	未	发行大声周刊， 现已停刊
工人抗敌 宣传团		不 定	未	间发近于共产党言 论之宣传小册，主 少数异党分子，主 持，乘机鼓动工 人风潮。
时事新刊社	王达飞 孙蕴实	商业场		言论颇见左倾 (国难三日刊之 化身)
青年记者协 会成都分会	王达飞		曾向本市前人 民团体指委会 立案	不定期开会，会 内多左倾分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省会警察局为本市发生抢米事件 应加强防范的通令稿

昨晚本市南门发生少数暴民鼓动群众抢米事件，对于市面秩序关系甚大。各分局所暨警察队治安有责，亟应随时注意严密调查，预为防范制止，勿往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如其辖区内发现上列情事，各分局、所、队已尽劝阻之力，群

众仍复抗聚不散，准其查酌情形逮捕首要解散协从，俾避免事件扩大，用维治安。倘有疏于防范、处理失当者，定于查酌情节轻重，将该分局、所、队负责官长分别撤办，以示惩儆。合行通令遵照办理，勿得稍涉疏虞为要。此令。

民国29年3月15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警察局督察处黄叔恺关于调查 美丰仓栈被捣毁情形报告

窃职奉派查视外北美丰仓栈被捣事件，庚即驰往该处查视。据仓栈负责人称：本日午后二时卅分，栈内工人闻后面回坝人声鼎沸，知有事变，因事前即有准备，已将前门关好，立派人报知有关机关。簸箕分所即在该栈斜对门，罗巡官速率闲班长警飞往制止。警备部亦来兵一排余多方弹压。谨将该栈后墙打倒一堵，当无其它损失。查本日人数约七八百人，由二水巷、张家巷、一水巷三路来的，附近市区老弱妇女居多，均携有竹箕，系准备撮米者。幸制止迅速，未酿意外，理合将奉查情形报请李主任转呈督察长核转局长钧鉴。

职黄叔恺

民国29年3月15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车耀先之妻报告其夫 被逮捕情形呈

窃氏夫车耀先，年四十六岁，大邑县人，住祠堂街一六三号，开设努力餐楼生理。突于昨夜十二时，被无符号无证件携带短枪之十余人，破门入室，不说原由，禁止馆内人等行动，四处搜查箱柜后，估将氏夫拉去，不知去向。氏以该等既无证件符号，又无保甲警同路，若谓政府逮捕人民，决不致毫无手续，当即驰报西区警察局，奉喻赅即予以清查，仍将被拉经过情形具报备案，等因。除分报外，谨将经过情形具报钧府，恳予彻查究竟，以重人命而维治安，不胜迫切待命不至。谨呈
成都市政府

车黄体先呈

民国29年3月17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省政府为查明车耀先 被捕情形密令

秘一字第3096号

令成都市政府

案据成都市祠堂街民妇车黄体先3月17日报告一件内称：窃氏夫车耀先，年四十六岁，大邑县人，住祠堂街一六三号，开设努力餐楼生理。突于昨夜十二时，被无符号证件

携带短枪之十余人，破门入室，不说原由，禁止馆内人等行动，四处搜查箱柜后，估将氏夫拉去，不知去向。氏以该等既无证件符号，又无保甲军警同路，若谓政府逮捕人民，决不至毫无手续，当即驰报西区警察局，奉谕跟即予以清查，仍将被拉经过情形具报备案等因。除分报外，谨将经过情形具报钧府，恳予彻查究竟，以重人命而维治安，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等情。据此。除批示并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查明办理具报，勿延为要。此令。

兼理主席 蒋中正

民国29年3月19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警察局南区分局造报镇压市民 抢米受伤员警情况表

局 所 别	职 别	姓 名	备 考
南 分 局	训 导 员	吕同峰	左眼角被石块击伤。
大悲巷分所	三等巡官	苏鹤鸣	腰部被砖石击内伤甚重。
	二等警长	姚玉林	眼部受灰沙周身受伤。
	三等警士	詹德轩	被石块击伤。
	三等警士	康元合	同上。
	市 民	曾治安	该民被重庆银行开枪击中左肋，当即护送四圣祠医院治疗，因伤势过重，于

3月15日午后在院身故，
业函知法院派员检验。

民国29年3月26日

分局长 于杰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省政府飭知查禁 《时事新刊》社密令

密编字第五号

令成都市政府

案据代理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密呈：“本年3月19日，奉成都行辕主任贺条令开：时事新刊与扰乱后防案件有关，着即查封具报。随复电谕于查封时并严密施行检查，各等因。奉此。遵即派督察员葛润身、于育根、钱兆丰，警察队长方季容，侦缉队长汤悟等会同前往执行，查获文件多起，并将重要职员王震东、陈敬希、张绍成三人暨工人二十一名带局。当将遵办情形连同王震东等三人暨重要文件先后呈复行辕讯究，工人二十一名取保候质外，所有奉令查封暨遵办情形，理合呈报钧府核鉴指令祇遵。”等情。前来。除指令并咨请内政部注销该社登记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

兼理主席蒋中正

中华民国29年3月28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成都市 执行委员会训令

社字第107号

查近十余日来本市米价飞涨不已，究其原因，不无奸商借口久旱，囤积居奇，操纵市场，酿成人造米荒现象，致有外南捣毁银行仓栈事件之发生，其妨害治安，影响民食，至深且钜。本党为代表民众，暨与民众谋真正利益机关，对于此种事件，自应切实调查，俾真相早明，以便会同有关机关协谋，抑平市价有效办法。为此，特制本市食米调查表，随令颁发，仰即依照表式所例，逐项填报来会，以凭处理。事关全市民食治安，务速送办为要。此令

民国29年3月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警察队方季容关于请发 犯人伙食费用签呈

窃职队前日重庆银行因米潮事件，缉押人犯72名及《时事新刊》社26名，先后共吃米1石4斗3升，每石购价70元，合洋86元4角。炭4挑半，每挑购价14元，合洋63元。综上所述两项，共合洋149元4角正，理合签请钧座府赐核发，以便旧

呈。谨呈

局长唐

队长 方季容

中华民国29年4月1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少城镇镇长报告 车耀先被捕情形呈

案奉钧府保教字第零六一九号训令，飭职迅予查明车耀先被捕情形，呈复报转，案因。奉悉之后，遵即查询该管保长余志成，当据答称：3月16日夜十二时，突有无符号无证件携带短枪之便衣十余人，到达祠堂街努力餐馆将车耀先拉去。事先保甲方面未接任何通知，故来逮捕之人，究系何机关派出，以及拉到何处，均以事出夜半，附近街民大多均在睡梦中，故无从查悉等语。查该保长所称各情，经职多方探询，均尚属实。兹据前情，理合具文呈请钧府核转备查，实为公便。谨呈

成都市政府市长杨

中华民国29年4月1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省政府查办外南黄门 仓栈被抢训令

令省会警察局

案据成都重庆银行经理姜仲光呈称：“呈为暴徒聚众肇事，捣毁仓库，劫掠米麦现钞什物，恳请严究主要，用维治安，仰祈鉴核示遵事。29年3月14日晚8时后，据本行外南黄门街办事处行警钟岳灵报称：本夜七、八钟时，突有暴徒多人蜂拥闯入本行外南黄门街办事处仓栈，捣毁仓库营业室及职员寝室。室内保险柜二只，储存法币一万余元暨库存米麦以及家俱床被衣物劫掠一空，失单另纸并呈。该暴徒等啸聚肇事不下一千余人，待军警闻报移时驰至分头镇压，并当场在仓内拿获暴徒多名，其为聚众倡乱已无疑义。窃查省会首善之区，军警林立，该暴徒等辄敢聚众抢劫，实属愍不畏法。若不呈请严究，殊不足以示儆惕而靖人心。伏乞钧府分飭为治安机关，严究首要，依法惩办，用遏乱萌，不胜沾感之至。所有暴徒聚众捣毁仓栈暨劫掠现钞什物为缘由，理合具文呈请钧府俯赐核办示遵”，等情。据此。除以“呈悉。据呈暴徒聚众肇事，捣毁仓库，劫掠米麦现钞各情，仰候令飭成都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派员查明，依法办理。此批”。等语批示并分令外，合行抄发原单，令仰该局即便遵照办理，仍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此令。

计抄发原失单一纸。

兼理主席 蒋中正

建设厅长 陈筑山

中华民国29年4月12日

【附】重庆银行成都外南仓棧失单

重庆银行外南仓棧遭受损失估计如次：

(一) 仓单：(抵押白米) 损失176张, 计数〔新〕双斗1760市石。

(二) 现米：计约新双斗350石。

(三) 水湿米：(仓垠遭受天雨) 约新双斗100石。

(四) 现钞：13802元2角2分正。

(五) 房屋：约30000元。

(六) 家具：4500元。

(七) 职工衣被用具损失约4000元。

总上七项共计损失〔除〕抵押品仓单1760石, 现米约450石(新双斗)外, 其余价值52302元2角2分。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省政府追缴《时事新刊》

社登记证训令

秘编字第36号

令成都市政府

案查查封时事新刊一案, 前经本府密令饬知, 并咨请内政部注销该社登记去论。顷准咨复: “案准贵省政府29年3

月28日秘编字第一号咨请注销时事新刊登记。等由。准此，除注销外，相应复清查照追缴该刊登记证，转部核销为荷。”等由。准此，合行令仰该府遵照，迅将时事新刊社登记证追缴来府，以凭送部核销为要。此令。

兼理主席蒋中正

中华民国29年4月27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邓锡侯、潘文华转饬协商 维持平糶米店秩序的代电

成都。严司令、杨市长、戴局长：奉委员长蓉行辕皋鱼战代电节开：“查本市平糶各商店门首麇集多人，争购食米，拥挤不堪，时起纠纷，殊属有碍秩序，亟应取〔纾等情。除〕分电外，希即协商妥善有效办法，并酌派军警弹压，以免妨害秩序，并将协商办法具报为要。

邓锡侯 潘文华 0810天正印

中华民国29年5月8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四川省政府指令

令四川省会警察局

4月25日法字第九号呈一件，为呈复成都重庆银行被暴徒捣毁仓库一案，已送请行轅核办，请予鉴核示遵山。呈悉。查此案即据该局连同人卷呈送行轅，仰候核示办理可也。此令。

兼理主席 蒋中正

建设厅长 陈筑山

中华民国29年5月21日

(成都市档案馆档案)

成都行轅对川康防止 奸党活动对策

说明：自从3月14日成都抢米风潮发生，不久南充、蒲江、金堂各县亦有类似纠众暴动情事，数月来在蓉市城郊，相继发生放火烧毁学校医院，人证确实，各大学校学生，间有失踪者；凡此均为奸党之发动，企图造成不安局面，实施民变暴动，造成恐怖，扰乱后方，破坏抗战，莫此为甚。为防患未然计，爰拟对策如左：

(一) 各地奸党活动情节重大者，得援用暂时处置汉奸办法办理。

(二) 各地党政军宪警团队学校工厂民众团体，应各筹商防止奸党活动有效办法，凡有关暴动行为，如抢米风潮、工潮、学潮等现象发生，不论情节轻重，均应速行标本兼治办法，以遏乱萌。

(三) 各地军警宪团队，应严格执行维持住地秩序任务，取缔行踪可疑之秘密集会及未经当地党部立案之团体活动，如遇类似暴动之集合，应即就地制止。

(四) 各市县党部应令所属党员全体动员，各市县各机关团体各企业作坊工厂应运用忠实干练党员，组织党团，普遍侦察奸党活动，实行主动的斗争，对民众更应加强组训，发挥训导作用。

(五) 三民主义各级青年团，各级团队，应注全力于侦察各校青年团体之反动份子，采取直接或间接打击奸党所领导之学生，并施行说服或感化，使之自新。

(六) 各市县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及企业工会，由市县动员委员会派人切实清查，重新登记，并随时召集负责人会议，宣示奸党阴谋，务使各安本业，发奸摘伏。其不合法之团体，查有反动证据，或有嫌疑者，应即就近商请党政机关设法取缔，并解散其组织。

(七) 应予拘捕讯究之奸党份子如左：(1) 利用机会煽动民众变乱或暴动及从事兵运有实据者；(2) 秘密组织深入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工厂意图暴动之主使人；(3) 操纵市面高抬物价意图扰乱社会秩序之奸党巨骗之首要分子；(4) 煽动党政军机关人员并勾结军警从事暴动与图谋不轨者；(5) 其他反动汉奸分子有造谣生事危害党国之阴谋或破坏抗战建国之行动查有重大之嫌疑者；(6) 各种非

法团体及未经党政机关所许可之文化机关，应即严行取缔，并讯究其负责人。

(八) 奸党分子查明有实据者，应分别予以监视讯究，并即呈报上级候示处理。其情节较轻之胁从人员，如系有知识青年，应送青年劳动营施行感化教育，如系无知民众，可取保结后释放。

(九) 为实施统一情报，及处理紧急意外事变起见，在省会设临时统一机关（对外不公开）指导各市县军警团队党员，负责执行防止奸党活动工作。各市区县亦得特立类似简单机构，由当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主持之。

(十) 各党政军机关负责人执行本对策时，应采严肃公正态度，不可稍有偏袒纵容，或挟嫌诬陷情事，其因此遭受谤害者，上级应予充分保障。

(十一) 各地党政军机关，为自救救国之工作，为每一党员或公务员应有之义务，其因此耗费之经费，除特别重大案件用费准予向上级报销外，应自行设法筹措。

(十二) 本对策自呈准之日施行。

民国28年5月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 致各省党部密令

(为取缔中共刊物捣毁销售中共刊物之书店)

共产党实施宣传政策：自办××书店外，复利用各书商

推行书籍，今后对付之方法为：

（一）对以营业为目的之书店，应以威胁方法或劝告方式，使其停止推销。

（二）对共党书店，应派人以群众面目大批收买焚毁之，或冲进该店捣毁之，惟事先应布置周密，与当地军警宪主管机关取得联系，接洽妥当，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其进行情形，随时呈报。

中华民国29年9月5日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

报刊资料

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

新中华报社论

正当着敌寇御用的汪逆汉奸政权正式成立，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正当着全国抗日军民及各抗日党派，特别是国共两党应报加强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以克服敌寇汪逆伪中央所给予抗战新的困难的时候，正当着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用血肉粉碎敌人“扫荡”捷报频传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于抗战团结不利，于国家民族有害的不幸消息。其一、是皖北行署调动大军分数路进攻新四军。根据新四军江北抗敌社电：

“皖北行署主任兼五路军十二纵队司令颜仁毅，五区专员兼十纵队司令李本一竟积极布置军事反共反新四军之阴谋……30日李专员之一部约千余人，皖东行署莫支队甘支队约二千余人，定□县吴（？）子常部五六百人，分头从西南北三路向我驻大桥之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令部，分进合击，

……现进攻我军仍未停止，且有扩大之虑”。同时根据新四军参谋兼江北指挥张云逸致李长官白主任电称：“李本一部继续捕杀我军人员数十人及地方优秀青年数百人，即合肥梁园一地，亦有青年数十人被捕，枪决者三名，并绑捉青年女学生，裸身游街示众……”此外，闻□□山之五路军部队已开始动员，不断向皖东开进，准备与新四军冲突到底。其次是成都某方唆使奸人匪徒抢米，希图以此嫁祸于共产党。根据本报所收到的中共成都市委员会所发出的宣言中指出，因为奸人匪徒的这次阴谋暴行之后，于是：文化界救亡份子车耀先唐医生等遭到被捕，在成都之公开共产党员罗世文洪希宗等遭到被捕，成都新华日报分销处被查，时事新刊被查封，该刊编辑李〔朱〕亚凡被枪决。凡此种种阴谋行动，不论其主观如何，在客观上是配合着敌寇向我的进攻，帮助了日寇进行“以华制华”的政策，配合着汉奸汪逆伪中央的成立，破坏抗战的行为，凡我黄帝的真正子孙——抗日的中国人民，对这些不幸消息的传来，莫不愤慨！

新四军从26年11月改编成立以来，迄今已届三载，始终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苦战，不断的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收复了大块的国土，动员了千百万民众起来为保卫长江保卫全中国而战，成绩昭著，中外同钦。截至去年年底，两年来，大小战斗达千次以上，伤毙敌伪军达一万一千余人，俘虏日伪军多于两千，缴获步马枪□千余支，击落敌机，炸毁敌铁路火车，破坏敌公路桥□，夺获敌军器材军用品，更不可胜数。敌人在华兵力共四十二师团，被八路军新四军所牵制者即达十七个师团（其中敌人有三个师团，即在江南为新四军所困。）即是说：八路军新四军以仅占全国我军总数约百分

之八的兵力，牵制了敌人在中国五分之二兵力。就是敌寇也不得不承认：“新四军驱之不去，打之不烂，愈打愈多，愈打愈厉害”。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所得到的荣誉的评语和称号，一贯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王者之师”，这正说明了新四军是坚决抗日，有纪律，百战百胜，受民众爱戴的军队。

新四军坚决彻底的实行着真正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在新四军保卫着的地方，完全驱逐了日寇汉奸的势力，人民得到了民权自由，生活也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对于友党友军，新四军始终执行着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对友军素本合作互助之旨，以期能建立亲密关系，共同杀敌。不幸得很，国内反共派及顽固份子，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专事磨擦，屡次武装袭击新四军，造成许多惨案。震惊宇寰的“平江惨案”尚未获得圆满解决，继之而来的，有“确山竹沟事件”，再继之以“程汝□的进攻”，从江南到江北，随着安徽政局逆转，又发生了今日的“皖北事件”。新四军食不得一饱，衣不得一暖，惟以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为重，努力坚持苦战于敌后，保卫着大江南北的锦绣河山，使这些土地的人民不致沦为日本的奴隶，这正是应该加以奖励的。但其所遭到的不幸，是反共派及顽固分子不断的袭击和捕杀，这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闻者实在寒心。

夫反对共产党，打击八路军，打击新四军，这只是敌寇汉奸汪逆所干的事情，而绝非中国的抗日党派军队所干的事情。今天中国人的枪口只应朝着日本强盗和汉奸卖国贼，而万万不应打自己中国人，“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

（毛泽东）在今天，如果一面反共一面抗日是绝不可能的，反共就是要灭亡中国，这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所以我们要警告那些不明国家民族大义的反共派及顽固份子，他们应该清楚的认识蒋委员长“反共即是灭华”的明训，不要一误再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遗臭万年！

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明正大的政党，此次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这与共产党目前所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因此，它只是国内奸人匪徒企图挑拨国共关系，藉以进行分裂投降，压迫共产党之口实。这种行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全中国人坚决反对的。

目前我们对“皖北事件”和“成都事件”均表示严重抗议，并号召全国抗日人民，一致起来反对事件的继续发展，并要求最高当局立即严予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惩办主谋祸首；抚恤被难人员及其家属。对于“成都事件”我们要求迅速彻底清查，严惩制造事件的奸人匪徒，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份子。同时，我们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根绝一切大小磨擦之发生，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彻底打倒汪逆傀儡政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原载1940年4月8日《新中华报》）

讨汪拥蒋，团结抗战

新中华报社论

自从汪逆汉奸的伪“中央政府”在敌寇愚弄之下成立后，全国各地军民，莫不愤慨，一致群起声讨。上海各界工会及群众团体首先通电揭破汪逆□用名义□造响应“和平”之阴谋，并声称反对逆伪组织拥护国民政府的抗战国策，天津一百三十个群众团体，一百四十万爱国群众及全国各地军政长官，各界人士，旅外各地侨胞，亦均先后通电讨汪，我国民政府外交部亦曾于三月三十日照会各国驻华使节，正式否认伪中央政府，昭告中外表明“中国政府与人民不问日本在中国境内所采之方法如何，始终坚决抵抗日方之侵略”。并警告了某些国家，对于汪逆“伪中央”“无论任何行为，涉及任何方式之承认，既属违背国际公法与条约，自应视为对中国民族之最不友谊之行为，而承认者应负因是所发生结果之全责。”同时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第五届会议的开幕词上，对摇尾乞怜于敌寇刺刀下的汪逆汉奸亦曾予以有力的打击，并声明：“非至敌寇最后失败，我们的抗战永不停止。”本届参政会在蒋议长领导之下，也发出了讨汪宣言。

从这些事实看来，今天全国上下对于敌寇汪逆的狰狞面目都已更清楚的认识，而一致要求坚持抗战，拥护蒋委员长的反对汪逆到底，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在今天，单是讨汪拥蒋还是不够的。要抗战得到最终的胜利，还必须加上两个重要的因素：民主和团结。没有这两个因素，不充分发挥这两个因素，就决不能打倒敌寇汪

逆汉奸，绝不能真正建立起独立自主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今天中国的抗战必须是民主的抗战和团结的抗战，中国抗战所以能支持了将近三年，并给予了敌寇以重大打击，这就是因为中国在抗战中有了相当的团结，开始发挥了相当的民主；然而中国抗战之所以还未能予敌寇以致命打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因为国内的民主与团结还非常不够，赶不上抗战的需要。

目前，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多数进步份子，其他各抗日党派及全国各抗日军民的坚决拥护之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依然维持着，且在抗战中起着重大作用，可是却没有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起来；更可惜的是，在抗战营垒中，还有这样一种人：梦想一方面抗战，一方面却提出与敌寇汪逆同出一辙的口号，进行“防共”“反共”的阴谋行动。于是就闹成了许许多多的流血惨案，如过去之“平江惨案”，“确山竹沟惨案”，最近之“成都抢米事件”，及安徽皖北行署调动大军分路进攻新四军等，这都是完全违反民族利益与抗战利益的不够团结的具体表现。

“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这本是上届参政会所通过的决议，本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目前汪逆的“伪中央”大放其“实施宪政”的烟幕，就是因为他懂得这点，所以企图以“宪政”来欺骗民众。）可是不幸得很，自从这一决议通过之后，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人民，青年，学生不但没有获得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反而受到多方摧残和压迫。如全国各地许多共产党员文化界份子和进步青年之惨遭屠杀，暗害，逮捕，甚至公开枪决，西安成都等地许多抗战的书店报馆遭受封闭，各地的抗战书报杂志受到严格的检

查，某些地方还禁止宪政座谈会之召开等等，凡此种种均证明着国内民主非常不够。而这就会影响着抗战团结与进步，这是值得全国上下严重注意的。

中外的历史证明，绝没有不求得对内民主和巩固团结而能胜利抵御外侮的国家与民族，中国今天则应该虚心接受这历史遗下的宝贵经验教训，一方面加紧全国各界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巩固国共合作，这就必须坚决反对磨擦，反对一切“防共”“反共”的阴谋行动；一方面争取宪政的真正实施，给全国人民各抗日党派团体军队个人以一切民主自由，这就必须全国人民的督促，必须本届参政会在蒋议长的领导之下尽极大的努力把上届国民参政会上通过的“实施宪政”的提案，敦促政府切实执行。

目前只有真正给人民以民主，真正巩固团结，才能保障抗战的胜利，摧毁一切汉奸傀儡政权，驱逐日寇至鸭绿江边的对岸。

（原载1940年4月12日《新中华报》）

盐警队与联保冲突 五通桥全场罢市

联保主任被殴激动民情，双方定期开会解决。

“川康社”五通桥通讯，犍为所属五通桥区，为产盐之区，历来市区异常繁荣，抗战军兴后，特命经济部在此设立机关专营其事，前有之稽核所（盐税机关）即行重新改组，所有职员均易省外人员充任，有该所之税警第二十七队队长

邬天英者，浙江人，于去岁初秋警报发出时，该队长身着白汗衫在街头徘徊，适与警戒部队（地方壮丁）相遇，伤其脱去白衣，以免空袭危险，而伊恃其为中央官吏，不但不脱甚至与该壮丁等相口角，其时联保张洪泽上前解劝，邬不但不服，且反唇相讥，并峙存报复。去岁冬间邬曾将该联保主任之胞兄张□毒打一顿，张等弟兄深恐酿成重大纠纷，结果忍受，当以为可从此了事，殊于本月6日午前十时许，张洪泽因到联保办公处，道经税警队营门时，突由营内涌出士兵六七人，手持木棒，将张洪泽拉倒，周身毒打，伤势颇重，其情甚惨，当时惹动公愤，市民有枪者，遂伙同联保处壮丁数十人，蜂拥上前，将该队长照样痛打，时税警士兵业已武装趋援，遂致双方放枪，税警队并将机枪架起扫射，耗去子弹一箱多，于是壮丁及看热闹之老百姓相继遁逃，一时异常紧张，地方人士以该队长如此野蛮，欺人太甚，相互联名主张公道，并立即戒严，同时各商店等，并停门罢市，事态似有扩大之象，闻双方已于7日开会解决，但人心惶惶不安云。

（原载1940年3月11日《新新新闻》）

成都行辕下令查封米仓

“中央社”消息：贺主任于前（14日）召集有关机关负责人进行会议决定平抑米价具体办法六项，严飭各主管官署切实执行，并于昨（15日）举行党政军会报，自昨日起实行封仓，由行辕、省府、绥署、省党部督同主管机关派员于今

日下午冒雨出发，查封附省银行存米仓栈。

（原载1940年3月16日《新新新闻》）

米价高涨原因

前昨连年丰收，正在高呼谷贱伤农救济丰灾之际，何致陡患米价高涨，即以川西平原，夙为属米之区，据精确调查，单就新都、成都两地归仓现米，已不下数十万石，存在四乡者尤多供求相衡，绝不应有米价高涨现象，且距青黄不接之期犹远，尤非米粮涨价之时，其所以造成此种现象，实为奸商操纵囤积居奇，发行仓飞买空卖空，尤其“赌期”所致，至于冬旱运输困难等因尚少，故当前并非米粮缺乏之“米荒”问题，而为人造之“涨价”问题。

（原载1940年3月16日《新新新闻》）

本市查封各种食粮 统计三万三千余石

“川康社”当局为平抑米价安定民生，经由党政军联合会报议决，将本市各仓栈米粮查封，并决定实行平价发售，现悉，各仓栈米粮已全数查封完毕，统计查封数量，计白米27014石，谷子1490石，麦子3600石，葫豆960石，黄豆670石，上列石数均系双斗折。又悉，附省各县米粮仓库，当局曾下令一并查封，据闻温江、郫县、新繁一带仓库，已于昨

(17日) 分别执行查封, 听候处理云。

(原载1940年3月19日《新新新闻》)

本市米价暴涨事件的总结(节录)

子 君

这次经政府查封仓米, 为数已达3,3000石;而农民银行, 农本局, 购粮委员会所购存数量, 还不知若干倍于此。

(原载1940年3月25日《新新新闻》)

回 忆 录

回忆一九四〇年成都“抢米事件”

郑伯克

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在其统治区对中国共产党进攻的一件大事。自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本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的方针，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加之英、美的劝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先后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竹沟事件”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达到了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成都抢米事件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统区的一件大事。

当时党的领导机构为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其公开的合法身份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的代表、重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书记邹风平，加

上组织部长程子健、宣传部长郑伯克组成特委常委。特委管辖的范围是川西（包括成都）、川南、川北、西康，成都直属特委领导。川康特委委员中还有张曙时、张秀熟，张曙时是统战部长，川康特委的青委书记是张文澄、妇委书记是甘棠。

国民党在成都的最高统治机构为：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即蒋介石统治四川的派出机构，主任为贺国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是邓锡侯，是拥有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有矛盾；四川省政府主席王懋绪是四川军阀中投靠蒋介石的；还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也是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常住成都。

1939年8月至9月间，罗世文去重庆南方局开会，回到成都，在川康特委扩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主要是：投降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即是为投降作准备，党的政策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党的建设主要任务是巩固。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突然袭击，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

特委学习、讨论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指示精神采取了具体措施。通知比较暴露的党员疏散，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停止，工作方式有所转变，党尽量隐蔽埋伏。

1940年3月14日在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当时市面上米价高涨，民怨沸腾，银行、奸商都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在国民党政府成都行辕的策划指挥下，特务们收买流氓痞棍，于14日晚集队呼啸过市，到新南门外地方实力派川陕边区绥靖主任潘文华所办的重庆银行的仓库时，便把库房门砸开，把仓库囤积的大米暴露在群众面前，并煽动老百姓去抢米。当时的穷苦市民，争先恐后去抢米的确实不少。

其实，在重庆银行仓库被特务痞棍砸开之前，周围即布满了特务。当晚《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正在新南门外印刷厂，他听到外面叫嚣闹嚷之声，即起身前去观看，误以为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并未察觉自己早已被特务盯梢。当无辜市民正搬运大米时，成都行辕事前布置的军警宛如临大敌地包围了现场，捕去多人，朱亚凡亦在其中。《时事新刊》是邓锡侯资助的，办报的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还有共产党员，是当时有名的进步报纸。朱亚凡被捕后，敌人审讯时，他义正严辞地讲抗日救国大义，敌人恨之入骨。一个姓冯的叛徒特务在审讯时，把一份伪造的中国共产党文件（主要说年关已过，要开展米荒斗争）塞入朱的口袋里，再从朱身上搜出来。朱亚凡当场指出这是诬陷，不承认他身上有什么文件。

3月15日，即抢米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川康特委常委临时紧急碰头，参加的有罗世文、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在焦家巷36号特委机关研究昨晚发生的事件。当时所知道的仅有重庆银行仓库囤积的大米被抢，至于朱亚凡被捕等情形尚未了解到。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敌人制造的类似“希特勒国会纵火案”^①的事件。罗世文补充说，敌人这样做，还有群众认为抢得好的。特委紧急决定，立即组织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转移。会开得很短，大约只有一刻钟。会后，立即分别通知党员疏散、隐蔽。

3月16日，形势急转直下，罗世文因处理一紧急事情，去祠堂街《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被守候在分销处附近的特务逮捕。因客观情况瞬息万变，特委便在一两日内随时碰头，及时研究对策。这时党员干部被捕的消息不断传来，特委统战部主要分管军事方面工作的车耀先（公开职业是中苏

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努力餐”老板）亦在16日晚间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新华日报》分销处的洪希宗、地方实力派的顾问郭秉彝（党员）、进步人士汪导予等。

特委紧急决定，邹风平、程子健、张曙时、甘棠立即转移到西郊苏坡桥附近的农民家里分散隐蔽，日常工作交郑伯克处理。

朱亚凡被捕后遭特务诬陷，于3月18日被敌人枪杀在小西门外去青羊宫途中的城墙边。杀人的布告是以成都行辕、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政府三个机关的名义发布的。成都行辕、四川省政府都在布告上盖了官防印信，唯有川康绥靖公署未盖大印。布告只提了朱亚凡之名，却未提及其政治背景。

朱亚凡字笛笙，中共党员，曾翻译过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56年版曹葆华译本改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36年冬，在上海参加鲁迅逝世追悼会葬礼，送鲁迅遗体出殡返回市区途中被捕，被辗转送到了苏州反省院。1937年“七·七”抗战后出狱，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与之接谈，劝他回四川参加当地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等工作。回四川后，他先在其家乡丰都工作，以后经党派往乐山地区五通桥（今属乐山市）通材中学以教书为掩护，负责该校党支部的工作，并参加五通桥区区委领导。1940年初调成都《时事新刊》任编辑。朱亚凡曾谈到，列宁那部名著是他与人合译的。他计划再翻译列宁的几部名著，已着手寻找俄文原版，可惜壮志未酬，遽尔横遭诬陷，牺牲于国民党顽固派屠刀之下，痛哉！

罗世文、车耀先等都被关进集中营，我同程子健商量，

找到王一苇（罗世文之妻），要她冒险去包家巷他俩的住所查看情况，倚仗她的亲属与政府当局的关系，大胆地进屋去把文件、信件等处理掉。王一苇遵照特委的安排处理完后，向特委作了汇报。当时房里的一切用具都未动过，她把文件、信札，还有些人名地址等都清理出来用火烧掉了。从这件事证明王一苇是个好同志，也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发现罗世文的住处。

几日来，我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党员干部的关系都联系上了，平时不引人注目的，能坚持留下的仍在原岗位继续工作；平日就有些暴露的，及时转移；对成都市几个区作适当调整，外东区与东区合并；外西区与城西区合并；城中区撤销，其所属人员分别划入城西、城北等区。党员就原有组织关系分别编组，不发生新的组织关系。纵不越级，横不越支，组织机构以精干为主，不开支部会，上下级大都单线联系，个别接头。

在郊区邹风平处，特委临时紧急碰头，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就当前形势进行了研究。决定向南方局建议：邹风平、张曙时、甘棠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在郊区隐蔽亦非长久之计，请示能否去延安。

特委派青委委员杨天华去重庆，把几日来的情况、对策、措施和建议报告南方局。杨天华去重庆不久即返回成都，带回南方局指示，调邹、张、甘三同志去延安，交通工具、启程日期、待南方局安排后通知。同时，杨天华带来了南方局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发表的《为成都抢米事件告成都市及全四川同胞书》。《告同胞书》揭露了“抢米事件”的全部经过，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

在破坏团结抗战，为压迫共产党和抗日救亡进步分子，为准备投降分裂制造口实。”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坚决抗议奸人、匪徒所组织之行动，要求中央政府（指国民党中央政府——编者注）立即彻底严查这次奸人、匪徒之行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分子。”

我及时把南方局指示及杨天华重庆之行的情况向程子健作了汇报，并立即组织党员翻印中共成都市委宣言，大量秘密散发。同时还通过统战关系，分送地方的有关人士。

抢米事件后，南方局曾派林蒙（甘道生）来成都了解情况。我在西门外茶店子同他碰头，详细汇报了事件的经过及特委的具体措施，并向南方局建议：我是因临时应急，才出来处理具体事务的，但仍随时向程子健汇报，请明确程子健为书记。不久，南方局正式通知：程子健为川康特委书记，原川北工委书记余代生（于江震）提为特委组织部长，郑伯克为宣传部长，组成特委常委会。

为了团结多数，争取地方实力派，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在抢米事件后，我几次到王文鼎处同他碰头。他是四川有名的中医师，地方军政当局佩服他的精湛医术。据王汇报，邓锡侯说，贺国光在组织抢米并抓了人后，即召开省党政军首脑会议。主要由贺讲了好些反对共产党的话，在座的有附和的，有不能不应付几句的，也有默不做声，或只点点头的。邓锡侯表示，对贺国光杀共产党人，他也有所暗示，布告上川康绥靖公署未盖印信即说明他的态度。潘文华对流氓痞棍抢重庆银行仓库即有所触动，不几天，潘部川陕边区绥靖公署顾问郭秉彝被捕，经王文鼎及其幕僚等向他提醒，蒋介石不仅迫害共产党人，同时也对地方实力派下毒手，使

潘文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认识有所提高。

抢米事件后，我去朝阳大学教师宿舍同黄松龄碰头。他是知名的学者、教授，他答应我去找刘文辉做做工作，以后，他对我说，他与刘文辉谈了几个钟头，分析了形势，展望了前途，为他如何坚持抗战团结和自保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刘文辉很满意，表示接受黄的意见。

蒋介石于1939年至1940年间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晋冀鲁豫地区军队和人民奋起反击下被粉碎了。“抢米事件”后，4月8日、12日，延安《新中华报》接连发表社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社论指出：“国民党当局必须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根绝一切大小摩擦之产生，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彻底打倒汪逆傀儡政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4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要全党提高警惕，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抢米事件后，中央即指示南方局，认为抢米事件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应引起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除成都市委发宣言外，必须动员广大社会舆论及四川地方有关方面，广泛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并指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隐蔽暴露或可能已被特务注意的干部；川康特委，必须暂时隐蔽，尽量减少活动。南方局遵照指示精神，发出紧急通知，川康特委接到通知后，当即检查连日来所采取措施。符合通知精神的继续加强，不足的、不符合通知精神的，立即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式上积极地转变。

抢米事件后，南方局常委、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派潘梓年到成都交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恢复营业，却拒绝释放被捕的同志。在成都，川康特委及时采取了紧急措施，接南方局指示后，更积极贯彻。被捕同志均正气凛然，严词否认敌人的诬陷。由于党采取了种种措施，才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嫁祸于共产党，妄图破坏川康党组织的阴谋。

1990年6月

关于成都“抢米事件”的回忆

张文澄

1940年3月14日的“抢米事件”，根据后来了解的情况，完全是国民党一手炮制的。是德国法西斯搞的“国会纵火案”的再现。它是蒋介石为达到既打击我们又打击地方势力的罪恶目的，派特务康泽带了两百多别动队到成都来制造的。

策划抢的仓库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设在成都的重庆银行的米仓。具体作法是：由别动队夹在群众中出面抢米。米仓对门是一印刷厂，受党影响的《时事新刊》就是在这里印刷。时逢朱亚凡正在厂里校稿，听到外面喊“抢米”，他出来看，马上被捕，送潘文华。特务诬陷说共产党抢米，是共产党组织人干的。潘不察真情，默认了。于是开始抓人。

同罗世文一道抓走的有推销处负责人洪希宗；同时抓走

“努力餐”的车耀先。还抓走永兴街口上一姓唐的挂牌中医。此人系《大声周刊》读者，后被发展，经常在车耀先家进出。

“武德学会”也列为这次事件的打击对象。郭秉毅也被抓，国民党以此挑拨我们和潘文华的关系。但川康特委机关以及下面各区委未受损失。我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安排善后。

“抢米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1979年2月15日

国民党特务制造“抢米事件” 逮捕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注)

李 维

1940年春，成都地区发生了所谓“米荒”，米价不断上涨。2月29日，每石米价43元，3月3日上涨至48元，3月6日上涨为54元，3月14日竟上涨至70元。川西平原尚为产米之区，1938年、1939年两年又获丰收。农民苦于“谷贱伤农”，虽然1939年发生冬旱，小春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但3月初旬已经下雨，又非青黄不接之时，证之实际，亦并不缺米。“据精确调查，单就新都、成都两地归仓现米，已不下数十万石，存在四年者尤多。”（据《新新新闻》民国29年3月16日第七版消息）又据国民党成都市有关机关不彻底地查封各仓栈粮食，统计亦达33000余石（同上报3月19日第七版）。那么所谓“米荒”的原因何在？完全是由于官僚资

本家、军阀、政客、大地主等四处派人抢购粮食，囤积操纵所致。当时盛行的投机方式有“包飞”（又叫“米包”、“包单”）、“赌期”两种。以“包飞”作交易，大家争买，买来后可向银行抵款，又去市场争买，完全是买空卖空的赌博方式，抬高米价，从中获取大利。“赌期”每天在南门染靛街一家大茶馆后面举行。参加的有各色各样的人，中间需要一个“公证人”（即经纪人）撮合，双方签订合同，预赌某某时间每石米要涨或跌若干元，并各缴一百石或千石的保证金，到期决定胜负。每天这样成交总在万石以上，于是米价在这批人的口里涨跃起来。国民党地方政府出售的一点所谓“平价米”，这时又比过去少得多，老百姓很不容易买到一升米。在这种完全人为的“米荒”情况下，市郊已发生划米口袋，抢米和吃大户的情形。

国民党顽固派自武汉失守以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积极准备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们为了实现此目的，需要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作为借口，因此，便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配合全国性的反共，并利用成都的“米荒”机会，国民党特务效法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纵火国会，嫁祸德国共产党的阴谋伎俩，在成都制造了一次所谓“抢米事件”，借以向共产党进攻。

1940年3月14日午后七八点钟时，国民党特务率领暴徒300余人，化装成老百姓模样，暗藏短枪，先在老南门外桐里吹哨集合，然后迳往成都重庆银行外南黄门街办事处，将其仓库、营业室及雇员寝室进行捣毁，损失甚大。捣毁后，又前往四川银行仓库进行捣毁，暴徒们在临走前均故意高

呼：“打倒下江人！”“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当暴徒进行捣毁时，警察在旁未加干涉。仓库被捣毁后，附近地上到处皆是米。暴徒走后，附近的老百姓前往拾米，好奇围观的人也很多。直到11时许，才有大批军警开到，将拾米的老百姓及围观者捕去约百余人，以作为特务暴徒的“替罪羊”，并藉以掩人耳目。

当晚，特务们将《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共产党员、丰都人）及一校对抓去（该刊编辑部设在新南门外一所平房内）。不几天，就以所谓“领导抢米”的罪名将朱亚凡枪决了。《时事新刊》和《星芒报》（均系进步报刊）同时被封。

3月16日晚上八九点钟时，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代表罗世文刚走进《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这时祠堂街一带的电灯早熄了，在营业处附近埋伏的特务见罗世文进了门，即撞门而入，叫所有的人不准动。不由分说地将罗架着往门外拖。罗当时高声抗议：“你们干什么？这是绑票行为！”当时街上人声嘈杂，来的特务不少。大约两个多钟头后，又有大批武装特务（约廿余人）冲入营业处，将事情发生后来处理善后工作的分馆经理洪希宗（共产党员、满族、成都市人）架走，并将营业处所有员工集中在一室，由特务们监视着不准动；同时翻箱倒柜，到处进行搜查，一直闹了一两个钟头才走。当晚，特务们又去祠堂街“努力餐”将车耀先捕走了。逮捕车耀先时，也是大批便衣特务包围着“努力餐”，一个特务在门外谎称车耀先有电报。门一开，几个特务涌入，问谁是车耀先，车面不改色地说：“我就是。”于是特务就把他架走了。

在“抢米事件”后，特务们还捕去祠堂街的唐医生和多子巷住家的马骥三老先生。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嫁祸于中国共产党，到处散布谣言说：●这次抢米事件是共产党领导的。他们一面不准各报登载这一消息；一面由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马上乘专机来成都亲自指挥一切。他们严刑拷问罗世文、车耀先两人，毫无所得。于是将他们押往重庆。其余被捕的人，洪希宗和唐医生后来被特务秘密处死，马先生和《时事新刊》校对被释放。

从“抢米事件”的经过和逮捕罗世文、车耀先等的整个情况来看，完全是出于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的一次阴谋活动。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中共中央南方局于3月下旬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印发了宣言，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4月5日全文转载了这篇宣言。除在成都到处散发外（党员忙了一夜），还通过党组织在重庆、西安等地散发。宣言散发后影响很好，刘湘组织的“武德学友会”传阅了此宣言，国民党省参议会也翻印传阅。足见此次事件国民党虽抓去了罗世文、车耀先等人，使党损失不小，但他们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损失确是很大的。

1964年4月29日

注：此文是1979年成都科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收集和整理成都“抢米事件”时根据李维同志提供的史料整理的。李维同志已去世，未作修改。

回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

潘健萍

我是1939年6、7月由自贡市《新华日报》分销处调到成都分处工作的。

我到成都分处工作时，分处工作人员有十三、四人，分处经理是洪希宗同志，报纸的发行量有一千多份。报纸由重庆总馆邮寄到成都分馆，然后再分送和邮寄川西北各县。1939年11月，改由重庆航寄纸型，由当天的欧亚航空公司客机运纸型到成都，委托《华西日报》（系地方势力派报纸）的印刷厂翻印，当天即可看到报纸。报纸由于寄纸型翻印，订价便宜，又快，报纸发行量由一千多份猛增到五、六千份，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当时的《新华日报》成都分处，除发行报纸外，还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成都的一个半公开的联络点，也是八路军的运输车从重庆到西安的一个必经的转运点。通过川康特委组织的一些党的骨干和部分爱国青年去延安学习，有的也是到分处联系，改装成八路军后勤人员，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延安。如1940年初，留养在成都某同志处的朱德的女儿，就是由分处的救护车送去延安的。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经常来分处，对外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

1939年冬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了所谓“抢米事件”。他们以“抢米事件”为借口，大批逮

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公开枪杀《时事新刊》的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同志。实际上其矛头是直接指向《新华日报》成都分处的。

3月16日晚，祠堂街一带突然停电，天正下小雨，街上店铺很早就关门停业了。晚上八、九点钟，罗世文同志来到分处，他刚进门，尾随他身后和暗藏在附近的便衣特务就涌进分处，持枪胁迫所有分处工作人员不许动，架着罗世文同志往外拖，把罗世文同志绑架走了。事后分处经理洪希宗同志布置大家作应变准备，同时向重庆总馆打电话联系，向总馆报告了罗世文同志被绑架的情况。洪希宗同志又给伪市警察局、成都行辕、警备司令部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捕我们的人。这些机关答复说“不知道”，他们没有派人出来捕人。只有警备司令部答应说，他们派人来了解情况。11点时电灯复明，一大群便衣特务又冲进分处捆绑走了洪希宗同志，并在室内翻箱倒柜，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离开分处。

“抢米事件”后分处受到打击，报纸的发行量由五、六千份陡然下降到一千五、六百份。报纸由航空运纸型翻印，仍改为由重庆总馆邮寄报纸到成都，再分发川西北各县。分处工作人员也逐渐减少。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时，报纸发行量已降到两三百份。工作人员已减少到四人，有申同和、李椿、彭代君、潘健萍。

原文载《新华日报的回忆》

1940年成都“抢粮事件”现场目击纪实

罗骏灌

1940年春，我哥哥的布店破产，我就在家等待就业机会。我当时刚满16岁，学徒年纪大了些，拜师的机会也难找。

我家住在华西坝，来去老南门都要经过黄门街。因为没有工作做，找人、蹭饭的机会很多。那是在春节过后不久，我从黄门街回家，已接近华西坝时，听说前面有人抢粮，我就急速返回去看热闹。当时拥挤在粮仓门口的人不少，因我是看热闹的，比较注意是些什么人。粗眼看，好象都是老百姓，多看一会儿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不少人穿长衫，里面套的黄军裤。因社会经验少，不知是什么原因，就当怪事对妈妈、哥哥讲。

1943年参加工作，谈到抢米事件时，我也向大家叙述当时看到的情况。

1988年3月6日

《时事新刊》的诞生和被查封的经过(节录)

唐会昌

大家知道，成都市的豪门奸商为发国难财，大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事，已属司空见惯。1940年春，他们囤积大量大米，以致弄得市民买不到米下锅，到处发生抢购现象。当时，南门外黄门街重庆银行仓库也囤积不少大米，3月14

日清晨，忽然聚集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在该地大喊把仓库打开，拿米出来卖，附近居民见状，也各持提筐口袋，蜂涌而至，挤满了大街小巷。朱亚凡闻讯，前往现场了解，谁知刚进入人群，就赶来一批宪警和便衣人员将群众冲散，而朱则被两个便衣人员强架而去。当天下午，有人提醒我一些可疑迹象，因此，这天晚上我回家去了，托熊哲夫就便照看编辑部。翌晨，我先去新集商场，看到《新刊》门面贴了伪警察局的封条，随即探知《捷报》也被查封了，住在《新刊》的营业主任王震东和几个工人都被逮捕，南台小学编辑室的资料全被洗劫，熊哲夫受到盘查。数日后，朱亚凡便被枪杀，罪状大意是：煽惑群众，指挥抢米，破坏治安，阴谋暴动。事发之日，我们都暂时各找掩护安身，相约以仁家巷二十一号张雪岩公馆为联系地点，常于夜间在那里交换情况，研究对策。苏爱吾首先向党的负责人罗世文、张秀熟作了报告。经各方了解，一致认为，这次抢米事件是希特勒火烧国会事件的重演，是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一切革命抗日进步势力的借口和开端。因为在抢米事件中，有内穿警服，外套便衣的人冲在前列。而重庆银行是潘文华办的，显然是企图借此挑拨地方实力派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所以事发之夜，他们就迫使邓锡侯和潘文华在送呈蒋介石的电报上签字，说居民抢米是共产党暴动。他们篡改朱亚凡的口供，说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奉共产党省委指示发动抢米风潮，并派他去担任现场指挥。他们害怕朱亚凡揭露其假造口供，所以立即将他杀害灭口，杀人，可以威吓群众，平抑米潮，又可以打击共产党，这就是他们一石两鸟的诡计。其实，朱亚凡体质纤弱，一贯沉默，终日埋头于编译资料，很少和人交往，外传他是

外勤记者也属猜测，若说他指挥抢米，就是三岁小孩也不相信。敌人出此下策，自以为得计，谁知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很快就被我们揭穿了。原先，王达非和苏爱吾在党的安排下搞统战工作，王和邓锡侯有联系，苏还在潘文华的川陕鄂绥署挂了一个参议的名义，常和潘的高级参谋黄秋侠有接触。这时，他们分头找邓、潘说明了真实情况。邓、潘发觉上了当，受了骗，才未让对方肆意横行，并设法救出了《新刊》的王震东等数人。但是，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已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四川特种委员会”来主持追捕地下党员和镇压革命群众，还把主任委员的名义强加给邓锡侯，贺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副之，实际负责的则是行辕特务头子调查课长张严佛，当时形势，日趋严重。

一天晚上，罗世文同志召集《新刊》部份同志在张雪岩公馆开紧急会议，列席者约七、八人，我也在座，他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敌人掀起的白色恐怖，方兴未艾，成都乃至全省将会发生更大的事变，为了安全，必须预防。”于是，大家围成一团，各人谈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意见，最后决定能在城内找掩护的同志可以留下来，乡下有家或有去处的就暂时下乡，实在困难的，还有一部到西安的汽车，可搭两三个人去延安。谁知就在这一次会后几天，全川性的大逮捕就开始了，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四位同志都被秘密逮捕，并立即送往重庆。此外，还有些同志被捕后遭秘密杀害。这次四川地下党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言之殊堪痛心！（略）

1981年11月于雅安

原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告成都及全四川同胞书” 是怎样送到成都的

杨天华

1940年3月成都发生的“抢米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事件。目的是为了镇压四川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挑拨地方势力同我党的关系。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中共中央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及全四川同胞书”，并急需将它送到在成都的中共川康特委向广大人民群众散发。

成都“抢米事件”发生时，我在中共川康特委青委工作。3月下旬，我接受中共川康特委的决定，离开成都，撤退到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我乘车到达南方局正是下午，到后才两个多小时，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同志就把我叫去。一见面就对我说：“组织上决定你马上离开红岩村，在48小时内赶到成都，将这份重要文件（即“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及全四川同胞书”）当面交给川康特委。”凯丰同志的爱人廖似光立即拿来针线，将文件缝在我西装上衣的垫肩里，汽车马上把我送到两路口长途汽车站。当时长途汽车站有规定，到成都的旅客要先登记，半个月后才能买到票。于是，我决定坐飞机。第二天凌晨赶到机场，售票员说：今天到成都的飞机还有两个座位，但一定要有警备司令部的介绍信或中央委员的担保才能买到票。当时我很着急，考虑再三，想起在重庆的一个

叫黄元汉的同学，我和她1935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过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她的父亲叫黄伯度，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社会部长。我想能不能找她想想办法。我坐车赶到她家，她刚起床，我把要求告诉她后，她对我说：我父亲是不会替你担保的，只有偷盖他的私章。说完她就悄悄跑进她父亲的书房，从抽屉里拿出她父亲的私章在担保书上盖了，又急忙跑出来交给了我。我拿着担保书转身准备离开，她叫住我说：你买飞机票时，他们一定会来电话问，我就守在电话机旁应付他们。我赶到机场买票，买票的看了我的担保书，一面忙说好、好，一面摇电话到黄公馆问是否有这回事，电话中回答说有。这样，我买到了飞机票，坐上了去成都的飞机。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成都的机场安全降落，我马上赶到川康特委机关，当面将“告成都及全四川同胞书”交给了川康特委负责同志。任务完成后，我又回到了重庆红岩村。

1990年7月

参 考 资 料

在成都“春荒暴动”的掩盖下

刘 襄 朴

1940年1月，我由重庆到成都，充任军统川康区特别组组长。这时，正是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正在各地施行。成都的特务机构更加紧了反共活动。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联名呈请蒋介石批准，在成都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以为统一全省反共行动的特务机构。我又兼任该会行动组副组长。

1940年3月，成都发生了饥民抢米事件，特务机构借此制造了共产党发动的“春荒暴动”案。对革命进步人士大肆逮捕和屠杀。我参与和犯下了这次事件的血腥罪行。

一、所谓“春荒暴动”

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春天，照例是粮食涨价的季

节。军阀、豪绅、奸商大肆囤积稻米，始而操纵市场，任意抬高市价，继则囤而不卖，形成有市无米，制造了人为的米荒。穷苦市民家无隔夜之粮，拿着米口袋，踉跄街头，每一张瘦削的面孔上，呈现出忧郁和焦急的心情。

1940年春，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刘周书等一伙就囤积了上千石食米在成都市老南门黄门街重庆银行的仓库里，因为时间久了，发生霉烂，把霉烂的米向府河里倾倒，消息传开，引起了劳动群众的愤慨。3月14日，一群饥饿难耐的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向南门外重庆银行仓库汇集，愤怒地吼叫：“我们饿肚子了，你们把米烂了往河里倒。”高喊赶快把米拿出来。但是，仓库的铁门紧闭，卫兵荷枪实弹，对着人群。这些情况，更增加了饥民的怒火，群情激昂。在仓库附近，人越聚越多。

这时，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得到南门外“抢米”的报告，立即电话通知坛神庙警察分所所长郭善祥率武装警察就近镇压，并加派一个保安警察中队前往，协助执行。同时，成都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也闻讯赶派部队前去逞威。这些为虎作伥的武装军警，对赤手空拳的老弱市民凶狠地殴打驱逐，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踩伤了腿。锦官城边顿时天昏地暗，受伤者的嚎哭声与逞威者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

《时事新刊》报社记者〔编辑〕朱亚凡，家住南门外，听到人声喧嚷，前往察看，混杂在人群里，采访新闻。郭善祥见他穿着不象普通老百姓，就认定他是临场指挥抢米的人，立即将他逮捕，押送省会警察局。

《时事新刊》是成都的进步报刊，国民党平日即视之如

眼中钉，认为里面有共产党人。唐毅听到朱亚凡是《时事新刊》的记者〔编辑〕，就阴谋把饥民抢米问题，扩大为共产党领导的，有计划的“暴动事件”。他捏造了一套朱亚凡的供词，说朱已承认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抢米事件是共产党指挥发动的，他就是发动“暴民”抢米的临场指挥者。

唐毅捏造好了朱亚凡的供词后，赶紧呈报伪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行辕，并去找中统四川调统室主任何培荣和军统川康区区长兼行辕调查课课长张毅夫商议处理的办法。何培荣，张毅夫正要找机会对平日所调查监视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唐毅所捏造的情况，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到了。他们遂商定，把所谓抢米问题说成是由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春荒暴动”事件，作为迫害共产党的借口。

张毅夫是个特务老手，他认为只有朱亚凡的假口供还不够，为了更多地说明“春荒暴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必须再制造一些证件。他与何培荣，唐毅商议，又捏造了一个署名“道生”发给成都市共产党员鼓动群众参加“春荒暴动”的一件通告，作为对共产党下毒手的又一证据。

张毅夫还考虑到，国民党还打着“国共合作”的招牌，万一中共方面要求与国民党共同处理这一案件，到那时，朱亚凡不承认他的口供，岂不现了原形。于是他与唐毅密商了另一条毒计，先把朱亚凡枪毙，使所捏造的供词死无对证。过了几天，成都街头上就张贴了成都行辕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会衔的布告，以“朱亚凡临场指挥‘春荒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朱亚凡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在特务的恶毒阴谋下，这样牺牲了。

此后，张毅夫把捏造的共产党发动“春荒暴动”案密报

戴笠，并拟具了早已监视的二十几个共产党的黑名单，报请逮捕讯办。

二、绑架

抢米事件发生后，张毅夫以兼任的特委会主任秘书名义，约集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宪兵第二团团团长兼特委会行动组组长周竞人，军统蓉站市区组组长谈荣章，兼特委会情报组长何培荣和刘崇朴，到将军衙门行辕调查课开会。

张毅夫首先说：“共产党发动的‘春荒暴动’，煽动暴民，扰乱后方治安，在特委会成立之前，我们就将此案报告了军统局，准备逮捕一批有关的共产党人。现接戴先生来电，‘已经呈请委员长批准，秘密逮捕’，特请各位来商量一下，如何行动。”

我们研究了逮捕的方法。唐毅，何培荣提议，由张毅夫汇出逮捕名单，交由参加的各单位分头执行。大家都同意了。并决定，由何培荣、周竞人、谈荣章和我各负责一个行动组，那个组逮捕什么人，会后分别向特委会直接联系。张毅夫说：“要逮捕的共产党人中，有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核心社’负责人郭秉毅、汪导予。这四人，关系重大，逮捕后，由各组暂时负责分别和单独关押。”他又强调：要确保秘密，决不能走漏风声，如被共产党知道，指名要人，那就不好办了。会上又决定逮捕时用汽车，以求迅速，避免被人发现。

第二天，张毅夫打电话叫我去特委会，派我负责逮捕郭秉毅。郭秉毅和汪导予是冯玉祥介绍给刘湘的，曾任四川省政府顾问，二十一军军官研究班教官，并主持刘湘系的“核心

社”。我因到成都不久，不认识他，张毅夫说：“郭秉毅的原报人是刘重威，我叫他给你当引线。”

刘重威是郭秉毅，汪导予的学生，军统蓉站的直属通讯员，他暗报郭、汪二人是共产党员，并利用师生关系对两人侦察活动。他拿着一本二十一军研究班毕业同学录来见我，上面有郭的相片，我同他商议逮捕方法，他出了一个主意：郭秉毅与前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傅真吾交往密切，由他伪造一封傅真吾的假信，约郭进城有要事相商，骗至途中无人处，加以逮捕。我早晨派人把信送到金牛坝郭秉毅的家中，取得收条转回后，即亲率便衣特务周伯威、林材、肖干、余恒志等人和刘重威埋伏在西门外五里墩——金牛坝进城必经之路的公路旁边守候，注视着每一个走过来的行人。当刘重威指着一个乘黄包车的人说，“郭秉毅来了。”我辨认不错，即示意周伯威、林材，当郭靠近汽车时，就出其不意将他架上汽车，我把手枪指着他，不许声张，同时迅速掏出一些零钞从车窗掷给叫喊要钱的黄包车夫。就这样把郭秉毅绑架到小南街永清巷军统川康区的禁闭室。

谈荣章也在这天率特务张治熙、曾有忠、沈涤、钟杰等负责逮捕汪导予。他们侦察到汪已去走马街张龄九家中，即埋伏在张宅四周，又估计到汪导予离开张宅可能去春熙路热闹地区，就把汽车停在商业场门口。汪导予从张宅出来，果然向春熙路走去，等走近汽车旁边，尾随的特务立即将他架入汽车。这种绑架人的车，是特别装配的，司机都是军统特务，见尾随的特务近车，用脚一踩，车门就开，立即关上，开车就跑。所以虽在商业场闹区，刹那间，行人也不知是什么事。他们将汪导予绑架后，送押在东胜街特委会内。

中统四川调统室早已对车耀先进行监视，张毅夫就派何培荣负责逮捕。何派特务李月辉、陈国荣、傅正伦等，在将军街、祠堂街一带守候，等车耀先经过，也用同样手段把他架上车，送押在中统的秘密拘留处所。

张毅夫把逮捕罗世文的责任交给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情报组组长杨茂涛，由杨指挥陈翔源去诱骗罗世文。陈翔源是罗世文的外甥，幼年即相熟，军统川康区早就利用他常去罗世文家，侦察罗的行动。决定大逮捕后，张毅夫还怕陈翔源打不破亲戚情面，不肯下毒手或至泄露秘密，乃施以笼络，允许介绍他参加军统，给他加薪晋级。陈翔源从此更加卖力，去罗世文家更勤了，报告的情况更多了。

绑架的那天，陈翔源在下午去罗世文家，等机会骗他外出。见罗世文很忙，怕操之过急显露痕迹，因此，直等到天将黄昏，才约同去春熙路买东西。杨茂涛率特务在东大街罗世文住所附近守候，正等得焦急，见二人漫步走来，就尾随至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门前，一拥而上，将罗世文包围，推进稽查处。时已黄昏，因而无人发觉。

过后两三天，宪兵二团警务团副团作桢率宪兵特务逮捕了唐鉴予、洪希宗等七、八人。谈荣章一组以清查户口为名，在正通顺街方白非家里，把方白非逮捕。何培荣一组，夜间在陕西街薛子方理发店，逮捕了薛特恩。我还派周伯威、林材，把西门外光华大学学生欧阳堂、施畏三诱进城内，谎说他们的亲戚在少城公园茶馆等他们谈话，行至长顺街僻静处，逮捕送往特委会关押。

照预订的名单和计划，除《时事新刊》报社社长王达非，川康通讯社总编辑田一萍〔平〕等少数人扑空外，其余都用绑

架和诱骗的手段，逮捕关押起来。

在审讯中，被捕的革命人士，都否认与所谓的“春荒暴动”有关。特务的目的也不在此，所以没在这方面深问；审问追逼的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企图得到线索，扩大迫害范围。开初，使用诱骗吓诈的方法，见达不到目的，就用酷刑逼供。据特委会书记李杰谈，他亲眼看到，审讯时“烧香火”、“坐老虎凳”、“背洋油桶”、“灌水葫芦”、“吊鸭儿浮水”等等酷刑都使用了。薛特恩因受刑太重昏死过去，特务用冷水将他喷醒，继续追问。唐鉴予因受重刑，腿成了残废。

在这样严刑熬煎下，绝大多数革命人士始终忍受一切肉体上的痛苦。特务的心再狠，手再毒，也奈何不得他们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甚至他们有的不承认是共产党员。

三、戴笠飞蓉

四月下旬，戴笠为处理“春荒暴动”案，专机来到成都。张毅夫向戴笠详细报告了逮捕和审讯的经过。戴笠指示他，对这次逮捕的共产党人，要多方设法使他们“转变过来”，以便能找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好作进一步行动；还没有逮捕到的，继续逮捕，不能使一个漏网。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四人要解重庆讯办。有关的文件要准备好，也要带去。其余的人暂时关押，继续审问，等他回重庆后再决定处理办法。他又指示：要多多注意这次逮捕后社会舆论和川康军人的反应。

何培荣是跨着中统、军统两个组织身份的特务。他去见

戴笠。戴笠嘉奖了他一番，说他在这次行动中和张毅夫配合得很好；并嘱咐他，在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上，务必要通力合作。

戴笠又下手令给张毅夫，派我接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所有在这次行动中的特务和我一样，以革命人士的鲜血，换得了不同的升迁和赏赐。唐毅调升了重庆市警察局长，张毅夫、何培荣都得到嘉奖。蒋介石并批准发给四川省调统室一批武器，以充实中统在四川的行动力量。

戴笠在成都住了一个星期，命我带同特务李向荣、林材，押解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四人，由太平寺飞机场随他的专机同飞重庆。飞机降落在重庆广阳坝飞机场，一辆大刑车载押着罗世文等四人，先到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随即转押于望龙门军统局拘留所。

我住在军统局枣子岚垭招待所，当天晚上，戴笠派人送给我驳壳枪十支，自行车五辆，充实稽查处的力量，另送给我个人美制左轮手枪一支，并嘱咐我：“好好的干，凡事多同张毅夫商量。”

大逮捕后，我注意到成都各方面的反应。一般市民，只知道为抢米案枪毙了的朱亚凡，但怕招惹祸事，不敢公开表示什么。成都虽有几家进步报纸，但要经过检查才能出版，因此反映不出真实情况。川康系的军政人员也摸不清这次密秘逮捕的内容。只有车耀先曾在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当过团长，知道他的人较多，失踪后，就在二十四军系的军政人员中传开，大概他们猜透是特务干的，所以，如吴景伯、张志和等曾说：“车耀先恐怕已不在人世了”。据我后来了解，郭秉毅、汪导予由重庆解往西安，交胡宗南监视。罗世文、

车耀先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在重庆磁器口松林坡被军统秘密残害，并用汽油焚尸灭迹。

特委会把罗世文等四人解往重庆后，照戴笠指示，继续在成都进行审讯和逮捕。1940年冬，根据审讯的线索，特委会又在成都发动了一次“年终大行动”，逮捕周建予、岳继训、蔡定焮等二三十人。

四、血债

1940年5月，张毅夫拟了一个“处死”的名单，呈报重庆军统局。5月下旬的一天，他打电话叫我去行辕调查课。唐毅、周竞人、何培荣、谈荣章也先后到了，张毅夫用仅能使我们几个人听到的声音说：“接到戴先生来电，对在成都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经转呈委员长批准，就地秘密处决。”因为周竞人先到，张毅夫已同他商议过，要用绳索勒死。我们都同意这个办法，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枪声惊动附近居民，传闻出去。杀害的地点，选在龙泉驿山上和东门外郊区两个地方，并决定在深夜里进行。任务由张毅夫分派。谈荣章、周竞人和我各负责一个组，交通工具及杀害时用的凶器，由特委会统一准备。

会散后，张毅夫把周竞人和我留下，一同乘小汽车去龙泉驿察看。龙泉驿在成都东约五十里的龙泉山山脚，有一排宪兵驻在场口东首靠公路右侧的一个小庙内。宪兵排长引导我们到二里外的一个坡地察看，那里道路曲折，没有人户，层层岗峦，最好隐蔽，就决定以那里为处决地点。周竞人当即命令那个排长，用作工事的方法，分两处挖七个深坑，限令当晚八点钟以前完成。

谈荣章一组，选择了新东门外靠河边的一个四面无人烟的乱坟地为处决地点。

晚上九点钟，我带同周伯威、林材、何秉彝、肖干、余志恒等一伙人去特委会。到时，见宪兵第二团警务团副周作楨带同便衣特务八、九人，武装宪兵一个班已等在那里。周竟人没有来，由周作楨代为执行。

特委会秘书施肇文，负责点交要处决的革命人士和所用的凶器。我先领了绳索、尖刀、手电筒、石灰等物，然后提了薛特恩、洪希宗、唐鉴予、胡芷游四人。提出一个就反背戴上手铐，用纱布条把眼睛蒙住，把棉花塞进口内，再用布带捆扎。周伯威熟于此道，动作迅速，绑好一个，再提第二个，很快完毕。我向施肇文打了收条，将四人推上汽车。

周作楨的一组，提了三个人，也照手续，迅速作完。

一辆大卡车里，七位革命人士挤在车厢正中，一群便衣特务绕坐周围，手枪抵上了膛，荷枪实弹的宪兵环立车厢四周；我同周作楨坐在司机台。汽车出了东门，向龙泉驿驶去。这次屠杀，虽是蒋介石批准，但对这种见不得天日的勾当，生怕被人察觉。我和周作楨叫司机把车开慢，车灯时闭时开，到达龙泉驿时，已经十一点了。

我们进入宪兵住的那个小庙，七位革命人士也被从车上挟持下来。周作楨听宪兵排长说，土坑已经挖好，便叫马上布置警戒，宪兵排长引导我们前往执行地点。

乌云遮盖了星月，天昏地暗，在那荒山野谷里，格外显得阴气森森，每两个人挟着一个革命人士，顺着灰色的羊肠小径，一脚高，一脚低地摸索前进，到达预先挖好的土坑旁边，立即照预定计划分组进行残杀。

我们打开革命人士的手铐，用绳索捆绑手足，然后搏倒在地。他们此时已完全明白了这是就义的时刻了，但还要斗争，拼命挣扎，嘴嚷不出来，就用尽全身气力摆动，冲撞。有的在挣扎中，摆脱了蒙眼的纱布，我用电筒照射，见到充血圆睁的两眼，射出了愤怒的火焰，使我凛然生畏。余志恒、肖干把绳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左右绞拉，几抽几放之后，腹部隆胀起来。周伯威、何秉彝、林材三人轮番用尖刀戳入小腹，鲜血随刀飞溅，气绝之后，推入坑内，撒上石灰，复土掩盖。

宪兵执行的一组，已先完毕，我们就一同返回成都。临行时，周作桢还命令那个宪兵排长把凶场血迹清除干净，尸坑扒复平整，免被人发现痕迹。

谈荣章一组，也在当天晚上，向特委会领了一个革命人士，用汽车载往新东门外预先选定的乱坟地残杀。听说谈荣章还临时派钟杰去老东门找了一个老特务李英到场帮助。那位革命人士尚未气绝，即被推入土坑，钟杰见他还在摆动，即跳下坑去，骑在他的身上，用石头向头上乱砸一阵，血浆飞溅，染红了刽子手的全身。

蒋介石批准的一桩屠杀革命人士的血案，在特务的精心布置下，以绝灭人性的残酷手段，就这样秘密结束。

1963年5月11日

（原件存四川省公安厅档案馆）

抗战中期蒋帮制造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的真象

李文平

一、人为“米荒”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特别是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又有都江堰的水利设施，从来就少有旱涝之灾，稳产高产，年年丰收，成为全国有名的粮仓。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期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法币天天贬值。而聚集在成都市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奸商、恶霸等，担心他们搜刮来的法币贬值，就大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既可以确保他们既得利益，又能够牟取暴利，真是一举两得。他们囤积的商品又以大米为最多，大米是人民生活之必需，无论买进卖出，都很方便，所以有钱有势的人，都看中了大米的投机买卖。当时，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刘周书，就在南门外黄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得不少。因为他们囤积的时间长久，有的已霉烂成块，无法销售，所以趁着夜深人静时，把那些霉米偷偷地从仓库后门运出来，倾倒在府河里。这不仅激起了市民的无比愤恨，就是在国民党的个别官吏中也还啧有烦言。有一次成都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商讨平抑米价办法，成都市长杨全宇在发言中影射了军政首长搞囤积居奇，这就触犯了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贺即怀恨在心。1941

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合川县查封了一起囤积居奇案件，牵涉有杨全宇在内，当时贺国光已调回重庆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他在批阅这一案件时，硬把杨全宇判处了死刑，以泄他胸中之恨。

1940年春，因为囤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市内所有米店都空空如也，一般靠每天劳动所得买升升米过活的广大劳动人民，拿着钱买不到米吃，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他们早知道黄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内囤积有大批食米，于是在3月14日晚，不约而同地跑到重庆银行仓库外去高呼：“把米拿出来卖！”该银行方面就把仓库大门关得牢牢的，对于群众的呼叫，全不理睬。而急待买米救急的人群，闻风而至，把整个黄门街堵塞得水泄不通，呼喊买米之声，响彻四邻。这时，成都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得到重庆银行的电话通知和所属下级人员的报告，马上派出武装军、警、宪和便衣特务，跑步到黄门街去镇压。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寰、股长陈维寰率领便衣特务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认为他就是肇事的指挥者，不问青红皂白，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去了。其余的群众，则被那些反动军、警、宪、特用棍棒殴打，强迫他们离开了黄门街。

二、栽赃陷害

这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被押送到省会警察总局后，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在审讯中问明，他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的外勤记者〔编辑〕。朱说，那天，他外出采访新闻，走到老南门内南大街时，看到一大批扶老携幼的人群，涌向老南门外，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也跟着跑了去。走到南

门大桥转弯处，看见黄门街挤得水泄不通，在重庆银行仓库门外，高声呼叫买米。他就站在人群中看热闹，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司法科长谭齐把审讯情况向省会警察局长唐毅汇报以后，唐沉默了许久，没有表示意见，最后叫谭听候指示。

唐毅，四川武胜县人。当过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的谍查主任，成都警备司令部的谍查，是一个钻营本事的袍哥流氓。对上一贯阿谀奉承，献媚取宠。他与成都私娼金蝴蝶有染，而金蝴蝶之女银蝴蝶又是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瓚绪的爱妾，他通过这种裙带关系，巴结上王瓚绪，充当了王的私人秘书。1938年夏，复兴社在成都的负责人史伯英、杨卓勋，通过唐毅拉王瓚绪加入了复兴社。原计划由史伯英陪同王瓚绪到武汉去见康泽，再由康泽引见蒋介石。殊不知他们到武汉时蒋已他往，康泽引他去见何应钦。接着伪中央发表王瓚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王瓚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委派史伯英为四川省第八政区督察专员，唐卓勋为江北县长，唐毅为四川省会警察局长。这样一来，唐毅的野心更大了，他认为只投靠王瓚绪还不够，想进一步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才能达到更往上爬的目的。当他听完了谭齐的汇报以后，知道朱亚凡是《时事新刊》的新闻记者〔编辑〕，而《时事新刊》是当时成都著名的进步报刊，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认为抓到朱亚凡就是他投靠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于是，唐专程拜访军统特务头子，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和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向他汇报了逮捕审讯朱亚凡的经过以后说：《时事新刊》就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朱亚凡是

该报外勤记者，是共产党分子毫无疑问。于是，张、何、唐三人密商决定：一、把朱亚凡口供篡改为他审讯时，“承认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并派他去担任现场指挥；二、将朱亚凡的全案呈报成都行辕办理，把朱亚凡名正典刑以灭口；三、扩大“春荒抢米”事件，配合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这样既可以平抑米潮，又达到打击、消灭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目的，一举两得。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后，指示司法科长谭齐把朱亚凡的口供全部篡改如上述。还伪造了一份署名“道生”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率领群众到重庆银行仓库去“敌仓抢米，扩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省会警察局把这些文件伪造好了以后，连同朱亚凡一并解送到成都行辕去办理。行辕军法处根据省会警察局的报告，判处了朱亚凡的死刑。成都“春荒抢米”风潮，就这样镇压下去了。

三、反共策划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发动起来了。成都市各大中学校的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工人抗敌宣传团”，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各种爱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国民党违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搞假抗日，真反共，因而最害怕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尤以成都市黄包车工人几次罢工运动，弄得当时的反动党、政、军当局，胆战心惊，坐卧不安。

蒋介石对大后方革命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感到很伤脑筋，蓄意策划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主子一声令下，各地大小喽啰立即闻风而动。1940年3月，成都的张严佛、何培荣、唐毅等特务头子即以所谓抢米事件为借口，首先把《时事新刊》记者朱亚凡，诬指为共产党所指派的“春荒抢米”事件的指挥者，由成都行辕公开枪决。接着，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二人联名签报蒋介石批准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专门从事逮捕、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罪恶活动。所以，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的秘密特务领导机构。它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部队、警察机关等组成的混合特务组织。他们为了拉拢地方军队势力，公推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为特委会主任委员，而以贺国光、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并指派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为主任秘书，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为书记（负实际责任），中统川调室主任何培荣为情报组组长，宪兵二团团团长周竞人为行动组组长，川康绥署特别党部书记长魏廷鹤为审讯组组长。以所谓“防奸肃反”为该会的政治口号。

四、大肆逮捕

四川省特委会成立后，即由参加这个反动特务组织的军统、中统、三青团、宪兵、警察等敌特机关，把他们平时侦查到的，登记有案的共产党人“黑名单”提供出来，由省特委会汇报邓锡侯、贺国光、黄季陆三人批准后，便交由各特务机关派出的人员所组成的临时行动小组去执行逮捕。这次

行动完全采用绝对秘密的方式，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逮捕方法，一般都是在深夜进行的。

例如，逮捕罗世文。因他是共产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的负责人，就不能直接到办事处去逮捕，便利用罗的外甥陈翔源（军统特务）到该办事处，把他诱骗出来逛东大街夜市，那里人山人海，异常拥挤，各商店又播放出极为喧闹的高音喇叭，差不多使人相互对话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当罗走到城守东大街成都稽查处门口时，特务们故意拥上去把罗挤进卫兵线内，就这样巧妙地把她逮捕了。

又如，逮捕郭秉毅的方式又不相同。郭是原刘湘的二十一军所办军官教育团的教官，又是该军的顾问，家住老西门外金牛坝，特务们不便到他家里去抓。于是，伪造一封川康绥署经理处长甘肇斌的信，约他进城商量要事，叫军统特务刘重威拿去面交。刘是军官教育团的学生，与郭系师生关系，平时又常有来往，郭接信后毫不怀疑，当即出门乘黄包车同刘一道进城。这时，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已率领行动组和一部小汽车，在老西门外犀角河与茶店子之间的五里墩等候。当郭秉毅所乘黄包车走到汽车附近时，特务们就突然将郭架上汽车，开进城内关押起来。

其他如，四川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大声周刊》的负责人李耀先和汪守予、薛特恩、胡芷澣、唐璧予、洪希宗、林栋臣、王永忠、方白非、黄是云、曹心哲、熊唯知、杜特夫、欧阳堂、施畏三、魏行之等二、三十人，都是在同一天深夜，由临时行动小组的特务，分别开车到各人住处去逮捕的。

那次被逮捕的共产党人，分别关在军统特务队看守所，

宪兵第二团团部和省会警察局等地方。并由成都行辕调查课司法股长谢清和，省会警察局司法科长谭齐，川康绥署特别党部秘书杨荫池等负责审讯。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收到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的电报得知这次逮捕情况后，当即乘专机飞到成都，住在金河街××号他的“行宫”内，亲自处理这个案件。他听了张严佛的汇报后，决定将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人提押到重庆去处理，并命令特务队长刘崇朴乘他的专机押送。对其余人员的处理，也分别作了指示。以后又把罗、车二人转押到贵州军统息烽监狱，直到一九四六年竟秘密将他们杀害在重庆瓷器口附近集中营的松林坡。郭、汪二人被释放后，则由军统派到陕西王曲集中营去任教官。

五、秘密屠杀

四川省特委成立后，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刑讯，迫害和凶狠的屠杀。单对“抢米事件”逮捕的革命人士，就秘密屠杀了十几人。其中，胡芷澐、唐鉴予、薛特恩、洪希宗四人被杀在龙泉驿半山腰，是由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宪兵二团警务团副周作桢二人负责执行的。刘与周两个家伙事先亲自到龙泉驿山上去秘密察看地点，选择在宪兵分遣排驻地附近，由周命令下属宪兵把土坑挖好，等到半夜才把胡芷澐等四人，用汽车押运到山上去，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死后，掀下坑去掩上泥土，以免被人发觉。

另外数人是由省会警察局特务谈荣章、曾友忠等人负责杀害的。他们选择的刑场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里，也是先把土坑挖好，半夜才把这些革命人士用汽车押运到那里去

残杀的。

五、刽子手升官

1940年成都“春荒抢米”事件，是由成都省会警察局长唐毅一手炮制出来的一个冤案。因为他反共积极，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赏识，是年冬，就被调升为重庆市警察局长。以后，又调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教务处处长，成为军统高级特务。

其次，军统特务队队长刘崇朴，在这次反革命事件中也很卖力，得到戴笠的嘉奖。当他把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人押送到重庆后，戴马上调他充任川康绥靖署稽查处处长，一直到1947年底，因他又参加了新政学系，巴结上了张群，得以调任四川省会警察局长。

军统特务陈翔源，也因出卖其舅父罗世文有“功”，则由一个特务通讯员被提升为特务组组长。

（原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戴笠其人》（节录）

沈 醉、文 强著

（2）反共起家的罪恶史

（略）。

1940年春天，成都附近平原发现旱象，一些小春作物受到影响。虽然旱象不太严重，但是一些大地主、米商和反动政府官员立刻囤粮不售，还四处派人抢购粮食，以便旱情

严重时，可以高抬时价，利市百倍。抗战几年中，四川可说得天独厚，年年丰收，一时春旱，本不足以为灾。但这种人为的灾害，却比天灾更厉害十倍。一些天天靠出卖劳力而每日购粮的升斗小民，便无法买到一升半斗，反动政府原来假仁假义出售的一点所谓平价米，这时反而比过去供应得更少。因为经手人拿出去卖黑市，一转手便可大发横财，弄得天还没有黑下来，便有人去卖平价米的地方坐着等到第二天早上开门时能买上几升。有些人几天都没有买到一点，而一些仓库却堆得连门缝里都流出米来。饿了几天的穷苦人民便从这些仓库门窗缝隙里连泥带土地扫着流出来的米粒，而管理粮仓的人员先是驱逐，后来就是殴打。这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抢”！囤着的饥民如大梦初醒过来一样，知道除此便无法果腹，于是一窝蜂地抢了一个仓库。消息传开以后，许多囤粮仓库和米店先后又有几处被抢。这时成都的反动军警当局所采取的措施，不是先售仓库囤粮来解决这一矛盾，而是加派大批军警保护仓库和米店，开枪打死、打伤了一些抢米饥民，并大捕参加过抢米的人。戴笠得到这消息后，马上乘专机飞往成都去进行镇压。他散布谣言，说这是中共所指使，企图在蒋管区后方城市发动暴动。他的阴谋除了为反动政府推卸责任外，并硬把这一事件加到中共头上，说中共不守信用，破坏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在后方制造暴动，以便借口可以大肆搜捕中共人员。1940年3月底，在他亲自指挥下，在成都“努力餐饭馆”等处先后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军委车耀先和在成都的中共党员十余人。当时，罗世文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成都的代表，车耀先是成都中苏文化协会的负责人。经他连夜亲自审问。酷刑拷打，而毫无结果。

他这一阴谋诡计既找不到任何物证，也得不到一句口供。被捕的共产党员都看出他血口喷人，想借故杀害共产党人的卑劣企图，宁死不屈，决不肯为个人生命而叛党，出卖同志。戴笠一再亲自向他们提出保证，只要他们肯承认抢米暴动是得到共产党上级领导指示的，便可释放他们并给以很多好处，否则就要处死他们，但他们没有被吓倒。当戴笠感到黔驴技穷，一点证据都找不到时，便只将罗、车两人带回重庆继续设法审问，其余的十多人在成都杀害，并选定在成都龙泉驿山上活埋。当这十多位中共人士被押解到预先掘好的大坑旁时，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川康区特务队长刘崇朴最后再次询问每一个党员，愿意活的，便承认这次暴动是由中共指使的，否则，即行活埋。在这生死只在这一句话的最后关头，仍然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为了自己想活而出卖组织和同志。当第一个坚决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以后，便被刽子手们将手脚捆绑投入坑内，他们以为这样总会有一个或几个在这种情况下能达到他们卑劣无耻的目的。但出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一个一个的投下，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一个屈服。他们失望到极点，把泥土盖了一半还在问：“想活的快说，不然马上完了！”结果一铲铲的泥土抛下去，而没有一点回声。这十多位英雄就这样大义凛然，从容不屈地全被活埋在那里。直到解放以后，尸骨才被挖掘出来。当时戴笠听到这一情况，都为之感到惊异。他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亲自押解罗世文、车耀先回到重庆，先把他们囚禁在望龙门，经过半年多种利诱威逼，始终毫无结果。戴笠因为他们中共地位高，时间长，一直希望他们能叛变，好利用他们破坏四川中共党组织，并且只要他们肯承认这次成都的暴动是

中共指使，便可作为发动一次大规模搜捕中共党员的借口，所以决定暂不杀害而送往息烽监狱去长期“感化”。戴笠并把他们改换了姓名，以免引人注目。他们的真姓名和身份只有息烽监狱少数负责人清楚。他们在息烽几年中一直坚持了共产党人最崇高的品德，毫无半点动摇。戴笠还经常问到他们的情况，有时也向蒋介石报告。直到抗日胜利，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提出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当提到两位烈士时，蒋介石竟当面说谎，硬说早已杀掉了。实际上是在他说过这句话以后很久才下命令杀害，并毁尸灭迹，以证实他说的是真的。当时罗、车已由息烽解到重庆，被害的地点是在磁器口杨家山后面松林坡戴笠住宅的汽车间附近，杀害后尸体均被焚化。执行的负责人是军统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少云和汽车大队长张秉午。

（略）。

张严佛(又名张吉夫)在成都

“抢米事件”及在重庆罪行的供词(节录)

1940年，匪成都行辕奉命在成都设置特种委员会。这时邓匪文仪系伪军校及行辕政治部主任。他想把持这一罪恶机构，并利用我做他的工具。但我已死心做戴匪的奴役，有一次正告他，我的身子既不自由，望他不要再在我身上转念头，在南京我已受了他的影响，再来彼此都不利。他从此对我含恨，说我忘恩负义。而他攫取特种委员会仍不死心，终于起初由他负责。后来戴匪到成都了，通过邓锡侯、贺国光的同意，硬夺回来，交我负责。邓锡侯、贺国光、黄季陆(伪省党

部主任委员)做名义上的主任、副主任，实际由我控制的。我派梁匪若节、李希负实际责任。我在成都时，已在遂宁等两三个地方发展了分会，我走后廖宗泽等更加扩大，这是与西安特种会报专门对付共产党同样性质的组织，而成都虽也有伪党政军各机关参加，已完全为匪川康区所控制。我在成都时，似尚有逮捕屠杀的事情，但后来发展的一切罪恶，显然是由我负责倡导的。

这时伪中央已凶相毕露的用镇压、拘捕、屠杀手段，公开对付人民和共产党。1940年（或1941年）春，成都春荒发生抢米风潮。伪省政府代主席贺国光和绥署邓锡侯命令警察局长唐毅，稽查处长刘崇朴并出动宪兵，对手无寸铁的老弱群众加以驱逐和毒打，并逮捕了几十个人，这是有名的成都抢米风潮惨案。而我是在幕后策划，伪警察局及伪稽查处去这样做的。其后我并根据匪军统局密令，对隐蔽在成都的共产党及所谓的嫌疑首要分子，来一次大逮捕。我分别督饬刘崇朴、谈杰夫及成都站长田动云（或颜齐）搜集材料，制成黑名单，经我召集刘、谈、田、颜及廖宗泽等开会，决定逮捕首要分子。分配任务后，于某一夜间同时动作。当由刘崇朴、谈杰夫、田动云等分区逮捕了中共四川省特委罗世文等四人。其时戴匪笠坐专机来成都了，罗世文等四人即由戴匪专机押到重庆监禁。我还派了刘匪崇朴随机护送。

唐匪毅原是军阀王瓚绪的走狗，为匪帮粉碎川康军人的团结，先把王匪调离了川省。但匪帮对唐匪还是不放心，于是利用唐匪制造抢米风潮惨案，说他有功，调升他为重庆警察局长，其实是迫他离开巢穴，是蒋匪御用匪特既定的计划。这都是我秉承戴匪意旨做成的圈套。我当时还替戴匪吸收了

匪宪兵团长周竞人，后来也加入了匪特武装部队。这时匪特监察处成立了，这是负责在后方水陆交通线上施行检查统制的机关，主要是对解放区、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加以严密封锁或控制。成都两个口子上成立了检查所，派匪许乾刚、向友兰分任所长。我严令他们特别注意对共产党的检查。飞机航空方面，我也叫刘崇朴对往来西安、重庆、甘肃的飞机，加以检查。

（十三）在重庆匪军统局担任秘书时期

1941年7月，我奉调到重庆匪军统局做秘书。川康区长交廖匪宗泽接替。初去时戴匪派我在他身边新设的机要室服务，有王匪抚洲、潘匪其武在一起做机要秘书，我审阅关于匪特秘密组织人事方面的文件。戴匪曾召集鄧匪祐坤，任匪建鹏和我计议攫取匪中央警官学校，以彻底完全控制全国伪警察行政。前者因李匪士珍（伪警校校长）有匪陈诚、戴季陶等替他撑腰，未能如愿。后者匪军统局后来设立了警务处，全国伪警察行政权，慢慢的完全归了匪军统局所掌握，全国人民遭受特务的镇压与灾害，也就更加普遍而沉重了。这都是我和毛匪人凤等协同戴匪一贯策划的罪恶。这时毛匪人凤代理主任秘书，潘匪处处巴结他。有一次戴匪表示要我做机要室主任。我说有了秘书室不必再有机要室的重叠设置。事虽作罢，但毛匪对我颇为忌刻，潘匪更不愿我爬在他上面，从此在我与毛匪之间，不断挑拨破坏，而我由外面回重庆时，两手利落，对戴、毛匪帮毫无搜刮贡献，毛和他的姘头，从此也对我冷淡了。

不久机要室取消了，我派到秘书室，审阅关于匪特秘密组织人事、训练、经理方面的文件。此时人事处长是李匪肖

白，龚匪仙舫副之。各地秘密组织的匪特分子在随时扩展中，匪特对帮会、汉奸、伪军的运用极其重视，匪军统局内，将近发展到一千人。匪训练处长为匪锡麟，除匪息烽、兰州两个训练班，电讯训练班经常诱骗青年，灌输毒素之外，还办了各地缉私人员训练班，外事训练班，以及所谓高级干部训练班。并在重庆办了一个立人小学，将匪特的子女也加以麻醉教育。训练处并编发一种刊物叫做《家风》，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行动完全隐没、歪曲起来，制造一些假情报，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杀人放火，以及活埋、屠杀等种种情形，以激怒一般匪特分子的作恶情绪。

这时蒋匪政权表面虽仍标榜抗日，但内部充满了投降情绪，匪军统局不仅和南北汉奸、伪军有了很多勾结，如与伪军张岚峰、孙殿英、郝鹏举等勾结反共。派刘丞烈与齐奕文、王克敏勾结等。并派遣了山西人李广和通过阎锡山到南京与汪逆精卫作了直接联系。李匪回重庆后写成两厚本报告，表说他的成就，盛称日寇大陆反共政策。其主要意义，为蒋、汪在日寇皇军统治之下合作“剿共”。当时戴匪怕李匪把真象宣染出去，伪装把李广和监禁起来。但实际对李优待。毛匪人凤对李照顾无微不至，并与李的老婆成了奸情。日寇投降后，毛匪派李为中将设计委员，在华北一带工作。1942年，叶挺将军夫人到了重庆，因当时叶将军被匪军统局监禁在磁器口白公馆附近一所房子里，戴匪派我看了叶夫人两次，伪装安慰她，后来叶夫人和叶将军见了面便离开重庆了。是年冬，因匪河南站长被牛子龙处死了。匪别动军第一战区指挥崔方坪、赵理居又因在河南活埋了伪行政专员等六条人命在洛阳奉命枪毙。戴匪备受匪帮及河南人民指责和

忿恨，而河南匪特分子不断倾轧戴匪。因派我到洛阳去收拾残局，我也自告奋勇，愿意出去耻表功，遂于12月由重庆动身。

(原件存公安部档案馆)

附：

张严佛罪行结论材料（节录）

（前略）

1939年任川康区少将区长，1941年任军统局本部少将副主任秘书。……

主要罪行

……

6. 参与指挥镇压成都“抢米风潮”，逮捕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

1940年3月，该犯任军统局川康区区长时，成都市民由于饥饿所致，捣毁粮店，发生抢米风潮，该犯即命令成都稽查处长刘崇朴、警察局督察长谈荣章等匪特协同成都警察局长唐毅，宪兵团团长周竞人指挥武装警察、宪、特镇压饥饿群众，当场打死新闻记者一名，打伤群众十余名，并逮捕30余名。事后该犯报请匪军统局批准，并亲自布置匪川康区区长廖宗泽、站长田劲云、刘崇朴、谈荣章等匪特，以抢米风潮的操纵和策划的罪名，先后逮捕了我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省军委书记车耀先和郭秉毅等20余人。经刑讯后，将车耀先、罗世文、郭秉毅、汪导予等四同志，用飞机押送重庆匪军统局迫害，并将洪希功（宗）、薛特恩、唐鉴予、胡

芷游等七人，以春荒暴动罪名报经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批准后，命令匪宪兵团长周竞人，匪行动组长刘崇朴秘密将该七人杀害于龙泉驿。1946年11月，该犯任匪保密局重庆军统局结束办事处主任时，又接匪首郑介民关于秘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同志的电令，该犯即布置特务郭文翰、侯楨祥等，将罗世文、车耀先同志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左侧松林坡小坪场杀害，并用汽油焚尸灭迹。

（原件存公安部档案馆）

国民党军统川康区组织材料（节录）

（1959年10月13日）

……

四、罪恶活动

①、1940年3月，川康区区长张毅夫（严佛）为了迎合蒋、戴两匪危害革命的积极心情，乃同省会警察局局长唐令果（唐毅）商议制造所谓“春荒暴动”，以此为藉口来迫害共产党派驻成都的人员。这一莫须有的事情立即得到蒋、戴两匪的批准，在成都进行一次大逮捕。张毅夫（严佛）奉命后派爪牙逮捕了车耀先、薛特恩等，又派行动组组长刘崇朴、组员周伯威、林泽等逮捕了共产党成都办事处负责人罗世文，又在外西逮捕了郭秉毅，后又逮捕了某报社（社名遗忘）记者〔编辑〕朱亚凡，共十来人。后得戴匪指示将罗世文、车耀先用飞机押送重庆，郭秉毅送交胡宗南处工作，以

便监视，遗留下来的薛特恩等数人就地秘密处决……

（原件存成都市档案馆）

国民党中统四川省调查 统计室组织材料（节录） （1964年7月）

（2）活动情形

……

1. 镇压抢米风潮：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春，四川的官僚资本，操纵市场，大量的囤积居奇，呈现人造米荒。成都南门外黄门街仓库发生饥民抢米，《时事新刊》记者〔编辑〕朱亚凡挤在人群当中看热闹，被军警逮捕后以共产党指挥抢米为名，把朱枪毙。

……

（原件存成都市档案馆）

国民党特务在成都新闻界 的罪恶活动（节录）

“中统川调室”在成都新闻文化界的活动。

国民党中央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其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科”，以后又扩大组织，自称为“特工部”。1938年7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中统”两字就由此而来。“中统”在成都新闻文化界进行罪恶活动，是这一部门罪恶史的大黑线，贯穿始终，罄竹难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统”派叛徒、特务员苟怀谦充任军委会特检处成都邮电检查所所长，苟派“中统”特务周世明混入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社和当时的《四川日报》负责人杜桴生、黄启明等领导的“群力社”，在内部窃取情报和名单。

1938年冬，中共参政员吴玉章、林伯渠、陈绍禹（王明）来成都，许多新闻界人士为他们组织讲演会、欢迎会，苟派周世明参加，窃取到不少情报和大批名单。

在这一时期，“中统”在四川的首脑机关川调室掌握的名册，几乎大部分是成都新闻报刊和文艺界活跃人物，包括作家、教授、演员、美术工作者，也有初学写作的文艺青年。如周文、曹宝华、何其芳、沙汀、艾芜、陈翔鹤、李广田、肖军、车耀先、罗世文、杜桴生、杨伯恺、杨道生、唐征久、应云卫、谢文炳、吴雪、田家英、戴碧湘、张宣、蒋慕岳等人，都被列入档案，作为监视和迫害对象。

1939年，中统局局长朱家骅派何培荣任中统川调室主任（以后兼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1940年，为了封锁革命进步言论，于成都市春熙路南段“中央社”内成立“成都新闻检查所”，何培荣兼所长，中统川调室情报股股长杨洁兼任该所军荐一阶新闻检查官。新闻检查与特务情报融为一体。

（原件存成都市公安档案馆）

思想反省自传 (1950年9月5日)

郭善祥1939年9月至1940年10月，任四川省会警察局外南大悲巷分驻所所长。因执行反动法令不力，遭局长方超的申斥，我即请假离职。

1940年曾执行反动政府法令，因米案及烟案先后逮捕劳苦人民十余人（姓名不详），送由分局处理释放。

……

三、作过些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情逐条写清。

……

（七）、1940年3月，任外南大悲巷派驻所所长时，贫民因米价高昂，发生抢重庆银行仓库食米，我派警士前往镇压，并抓押许多贫民送分局处理。

原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九分局代理局长 郭善祥

（原件存成都市公安档案馆）

后 记

为了历史地再现“抢米事件”的全过程，我们编辑了这本资料丛书。

这本丛书的编纂，是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在编辑方法上，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及资料的性质编排的。

这本丛书是在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由潘清雍、岳建功、姬涌等同志负责编辑，吴文华、张光诚同志审定。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市第一档案馆以及亲历这一事件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资料的选择和编辑中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希望党史界的同行及老同志批评、指正。

编 者

